

第八章 广西客家与近代中国

众多的论者认为：客家人富有民族思想，具有反抗精神。此说甚当。纵观客家人自秦汉以来的迁徙史，每当民族蒙难、国势陆危之际，总是不惜抛弃家园，别离故土，跋山涉水，辗转万里，为的是不甘屈服于异族的欺侮凌辱，求取国家的稳定与富强。从表面看，迁徙远去，与抗争相悖，是消极行为；但在长期的迁徙和艰苦的流亡中，也强化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其不甘屈服于敌对者的精神，其中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帝的抗争，也多有客家儿女的参与。太平天国在广西的起义和进军，从两广走向江南，为的是对一个农民天国的探索 and 追求。中法甲申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直至人民解放战争，以及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战斗，广西的客家儿女和全国人民一道，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太平天国革命

客家“六王”，起义的核心人物

清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场伟大的农民战争。它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后，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专制，反抗外国侵略，谋求国家独立富强的性质。它酝酿并起义于两广。从它的领导核心成员到太平军的一般战士，客家儿女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它的中坚力量。

洪秀全和冯云山，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首倡者，他们出身于广东花县，是客家农村的知识分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入广西发动起义时，首先响应他们并建成第一个拜上帝会团体的是贵县赐谷村一带的客家人。随着革命活动的发展，拜上帝会在两广建立了桂平、平南、陆川和广东信宜的斗争基地，也都在客家人居住的地区。从金田起义的6个“大头子”，到永安州封王建制时的6位“苦力王爷”，都是客家人。除洪秀全、冯云山外，就是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杨秀清（1821-1856年），祖籍广东嘉应州，客家人。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其先祖迁徙广西，世居桂平县鹏隘山东旺冲新村。以耕山烧炭为业。他“性机警，喜用权智”，且“素有异志”，常于家中“款接侠徒”。经冯云山发动，加入拜上帝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远在广东，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危机四伏。杨秀清机智地伪托天父下凡传言，挫败各种阴谋破坏者，群情振奋。金田起义，其参与制订各种制度、条规，率军征战，多有功劳。1851年秋，太平军攻占永安州，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并授命节制一切。从此，“自揽大权，独得其实”。1853年进驻南京，杨秀清主持太平天国军政，立法安民，事事严整，故“上下战功利，民心服”。1856年，死于天京内讧。^[1]

萧朝贵（约1822-1852年），父蒋万兴，母盘氏，居桂平鹏隘山下古棚村，客家人。朝贵因过继萧玉胜为子，故改姓萧。与杨秀清比邻而居，皆以耕山烧炭为生，彼此过从甚密。朝贵妻黄宣娇，因与杨秀清互认兄妹，故又名杨宣娇。朝贵性勇猛，富谋略。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附身传言不久，朝贵亦伪托天兄耶稣下凡附身传言，维护了拜上帝会的安定团结。金田起义前夕，朝贵奔走于贵县、桂平、平南各地，教导会众，策划起义，洪秀全等亦多听从。誓师起义以后，朝贵率军征战，身居前敌，所至多克。1851年在永安，以功封西王。1852年夏初，全军突围北上，围攻桂林，进军湖南，朝贵皆当前敌。同年9月，朝贵以“长沙城障防疏”，自请率军从湘南北驰400里，歼敌2000余。12月，在长沙南门中炮，壮烈牺牲。^[2]

韦昌辉（1824-1856年），原名志正，又名正。祖籍广东南海县，客家人。明末清初，其先祖迁广西，定居桂平金田村。他家资富有，少曾读书，知文义，有急才，遇事能见机应变。因无功名，常受乡中士绅欺负。洪秀全、冯云山至桂平宣传敬拜上帝，韦昌辉合家信从，并以家财支援拜上帝会，在家秘密打制武器。金田起义团营时，昌辉父子尽倾家中所有，并率家属百余人参加起义。1851年在永安州，昌辉受封为北王。从广西进军江南，受命负责全军“典粮饷”。建都南京后，随杨秀清“协理军务”，并办理对外交涉，接待英、法、美各国来访者，对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和尊严，尚能不辱使命。1856年，因挑动“天京内讧”，刺杀杨秀清及大批老兄弟，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被洪秀全处死。^[3]

石达开（1831-1863年），祖籍广东和平县，客家人。清乾隆末年，其先祖移居广西，立业于贵县北山里之那帮村。达开少年英俊，胸怀大志，喜读孙子兵法。16岁时，因受土人压迫，参加拜上帝会，成为一方首领。在起义进军中，攻坚破敌，屡立奇功。1851年在永安受封为翼王。从广西进军江南，达开统率前军，以“善战多奇计”，故所至多克。建都天京后，与韦昌辉为杨秀清“协理天事”，且奉命出巡安徽各地，慰问疾苦，安顿流亡，设官安民，易制征税，使农工商贾各安其业。开创了“军用裕而百姓安”的清明局面。1854年，奉命率军西征，屡败曾国藩湘军，光复武昌、九江、安庆诸要地，重操长江上游主动权。1856年“天京内讧”，军心涣散。达开被迫“率军远征”，6年之间，转战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广西、湖北、贵州和四川等省，最后兵败大渡河，终至丧师身死，时年33岁。^[4]

客家儿女，起义的中坚力量

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广西的贵县、桂平、平南、陆川、博白和广东的化州、信宜等地首先发动起来的，参与者多是客家的青壮男子和妇女儿童，其中还涌现了一批英勇善战的骨干分子，如桂平的秦日纲、曾天养、林凤祥、李开芳、杨辅清，贵县的赖文光、石祥祯、石镇吉，平南的卢贤拔、谭绍光，藤县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陆顺德，武宣的曾水

源，象州的曾剗扬、谭体元，陆川的赖九，博白的黄文金，以及信宜的凌十八等，还有桂平的黄宣娇（杨宣娇），平南的胡九妹，信宜的陈叶氏，则是当年拜上帝会众学习的榜样。定都南京以后，陈玉成、谭体元等一批参与起义的少年儿童，在艰苦的磨炼下，成长为叱咤风云，常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方统帅；而那些被诬称为“大脚蛮婆”的广西客家妇女，在太平天国朝内与太平军中为军师、丞相、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等官者亦不少。^[5]由此而观，客家人实为太平天国的中坚力量，而广西客家人又是构成这个中坚力量重要的群众基础。

太平天国立国 14 年，刊行各种书籍 40 余部，发布各种文告、凭据至今存世者 300 余件。在太平天国的文书中，特别是领导者发布的“诏令”和草写的书籍中，用的全是客家方言，而且不避“俚语俗词”。这是太平天国文书的一大特色。在江南，太平天国的兄弟姊妹们虽然离乡万里，而乡音不改，生活起居，风俗习惯，依旧客家本色。凡此种种，又常令中外论者咄咄称奇。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的 14 年间，以广西客家儿女为主力的太平军，先后转战于旧中国的 18 个行省，攻占大小城池 600 余座（次），在反对封建统治，抵抗外国侵略中建立了功勋。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胜利的进程中也滋生了贪图享乐、独断专横、争权夺利等消极因素，在内外敌人的联合镇压下，终于难免失败的命运。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为深刻，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

[1] 参看拙著《太平天国人物·杨秀清》。

[2] 参看拙著《太平天国人物·萧朝贵》。

[3] 参看《太平天国人物·韦昌辉》。

[4] 《太平天国人物·石达开》。

[5] 张德坚：《贼情稟禀》卷三《伪官制、伪女官》。

二、抗法援越和抗日保台

刘永福援越抗法

19 世纪 80~90 年代，先后发生了法国侵略越南，并欲进犯我国西南广大地区的中法甲申战争，继之是日本侵略我国台湾的中日甲午之战。在援越抗法和抗日保台的义战中，一支以广西客家人为主力的劲旅，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

刘永福（1837-1917 年），小名刘二，后改二为义。原名建业，号渊亭。祖居广西博白县御前村（今东平镇富新村）之秧地坡。^[1]因生活困难，其父刘以来几经迁徙。道光十七年（1837 年），刘永福生于防城县小峰乡。少年时代，因家庭“频遭困厄”，随父转迁上思州平福圩，“架茅作舍，批坡而耕”，仍难温饱。17 岁时，父亲去世，永福无以为家。^[2]咸丰七年（1857 年），在迁隆州（今宁明县）加入会党郑三部。第二年，参加吴凌云在新

宁州（今扶绥县）的反清起义。同治三年（1864年），永福自率300余人驻归顺州（今靖西县），以北帝庙七星黑旗为所部旗帜，故称黑旗军。第二年，率部入越南，先后以六安州和保胜为根据地，开荒屯垦，护商征税以自给，百姓来归者颇众。永福挑选精壮，扩充军旅，建立左、右和前营，分别以吴凤典、杨著恩和黄守忠为管带。全军人数约2500人，成为越南北圻的一支劲旅。

当时，法国侵略军已经分批深入越南，河内、海防等地备受威胁，而越南王朝无力抵抗，求助于驻扎高平、谅山的清军。而清王朝命令清军不许介入。刘永福则以法国“所作所为，不独虐越南，实欺中国也”，决定助越抗法。同治十二年（1873年），首败法军于河内，斩其首领安邨(F. Gamier)，“覆其全军”。经此一战，“夷见黑旗，相率惊避”。^[3]越南王朝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清廷则授予刘永福四品顶戴。

1882年4月（光绪八年三月），法国驻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李威利(Henri L. Reriere)率军强占河内。越南王朝再次吁请刘永福出师拒敌。5月中旬，黑旗军在河内近郊的纸桥与敌人展开激战。右营管带杨著恩身先士卒，壮烈战死，勇丁亦伤亡百余人。而敌酋李威利中枪落马，跪地求饶，敌人慌乱狂奔，又以失败告终。捷报传出，边关欢动。此后，刘永福率军驻守越北红河地区，与岑毓英军协同作战。有记载说：“刘永福据（越南）山西、兴化、宣光二十余年，是处军民知有刘永福，不知有越南王。”^[4]

刘永福率师援越抗法期间，曾经数次派人回博白及钦州、上思州各地招募青壮入伍，故黑旗军中的管带、帮带、哨官、哨长即有客家人100余人，杨著恩是钦州客家人，黄守忠是北江客家人。^[5]而在勇丁中客家人亦占多数。据调查，仅博白一县参加黑旗军的客家青壮即达1200余人，其中由三育乡刘荧楼一次招募出关加入黑旗军的即达500余人。^[6]

冯子材与南关大捷

光绪十年六月（1884年7月），法国大量调兵进驻越南的同时，把战火引向我国福建沿海。1884年8月，清政府被迫向法国宣战。在越南战场，广西是法国进犯的主要目标。由于清廷内部意见不一，消极对敌。1885年2月，法军突破镇南关，形势危急。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年近70的冯子材协理广西军务，与广西提督苏元春联合各军，共同对敌。

冯子材（1818—1903年），字南于，号萃亭。祖居广西博白县水车堡长塘甲狮子垌村（今顿谷镇大塘村龙湾垌狮子头屯），后迁广东钦州沙尾村，客家人。^[7]1862年至中法战争前，冯子材曾任广西提督20年。期间3次应越南王朝之请，率军出关“代平内乱”，在广西和越南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当南关危急，抗法战争节节失利之际，冯子材临危受命，以原有的广东高、雷、廉、琼四府团练为基础，组成萃军，开赴南关前线。子材被公举为前敌主帅，协同各路友军，于1885年3月重创法军于关前隘，随即分兵出关追击敌人，连克越南文渊、谅山各地，取得了我国近代史上“中西战争第一大捷”。^[8]实现了全军

将士“誓用敌颅建国门”的宏愿。与此同时，战斗于越南北圻西线的黑旗军和岑毓英指挥的滇军，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无耐清廷坚持“乘胜即收”的消极政策，抗法将士被迫“挥泪班师”回国。

冯子材先后在钦州、上思州招募的萃军 18 营，内中多有客家子弟。据《中法战争调查实录》提供的资料统计，萃军中的督带、帮统、管带等 23 人中，就有 12 人是客家人。其他如督战委员、襄理文牘等文武员弁，也多有客家人。而时任广西提督，受命督办广西军务的苏元春，在他统率的桂军中，也多客家子弟。他们无论在南关大捷，或在越南谅山的追击战中，始终与冯子材统率的萃军“分任战守”，协同作战。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又在近 10 年的边防建设中流血流汗，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其伟大功勋，亦当永载史册。

客家地区的“教案”

在抗法援越的战争中，广西各地的客家儿女还多次发动或参与了反对法国教士妄图与侵越法军里应外合的图谋。主要的如：光绪九年（1883 年），贵县桥圩人李亚英，因痛恨法国侵略越南，聚众数百人，捣毁了三板桥天主教堂，拘捕并驱逐教士李神父(Pernet)和罗惠良(L. M. Lavest)。光绪九年十二月（1883 年 1 月），盘踞在上思的周绍良(Lacaille)和马若望(Barrier)因密藏武器，勾结匪徒，图谋不轨，是以被驱逐出境，并查封教堂 3 处。此后数年间，贵县、北海、柳城、上思、桂平等地，也因法国教士聚集匪徒“谋往越南助乱”，发生了驱逐教士、查封教堂、没收教产等事件。而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游勇首领游维翰，因痛恨法国侵略，在凌云逻里杀了教士邓神父(Nazel)。第二年，在永安州，因为教士苏安宁(Bertholet)私设公堂，殴打乡民，激起众怒，捕杀了苏安宁及其随从二人。面对这些“教案”，腐朽的清政府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竟把龙州水口乡的游维翰和永安州的黄广祥、李亚安等几个客家人指为“凶手”予以杀害。^[9]但是，人民群众的反抗，给侵略者的打击是深重的。一个外国教士谈到广西天主教的历史时说：黑旗军故乡的老百姓对侵略者怀有深刻的仇恨，他们“好似遵守公约一样，都抱着报复、怀恨的心情”。因此，在广西，教士和教会得不到社会的同情，也就不难理解了。^[10]

刘永福台南抗日

中法甲申战争后 10 年，又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抗日保台的战斗中，刘永福和台湾人民通力合作，为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权益，再次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日本自从同治七年（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即确立了对外扩张的政策。我国台湾和朝鲜半岛是其侵略的首要目标。同治十三年（1874 年），日本出兵进犯台湾。光绪二年（1876 年），日本出兵朝鲜，并一再在朝鲜制造“兵变”和“政变”，阴谋占有朝鲜，进而侵略中国。光绪二十年四月（1894 年 5 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代

平内乱”。1894年7月，日军闯入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同时突袭中国赴朝的海、陆军。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由于清政府坚持避战静守的方针，导致军事的失利。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除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和赔款、开口通商并准许日本在华设厂制造等条件外，还将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是自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以后最为严重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当中日战争日益吃紧的时候，有人想到了当年的抗法英雄刘永福。在大学士翁同和的一再推荐下，时任南澳镇总兵的刘永福以“帮办军务”的名义，率黑旗军旧部及新募潮勇千名，从南澳直航台南，投入另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以后，台湾绅民相继鸣锣罢市，群起集会，发布檄文，抗议清政府投降卖国，声称宁可“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大陆各地绅民亦纷纷上书清廷，痛斥出卖台湾、丧权辱国的罪行。但是，一周以后，日军即攻陷基隆，台湾巡抚唐景崧等官绅纷纷“内渡”。而台湾人民在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等带领下，3次推举刘永福为抗日军民首领。刘永福虽三辞众人之请，却坚决表示：愿与台民“甘苦与共，生死与共”，合力“剿除倭人，光复台疆”。^[11]

6月，日寇从台北分兵三路犯新竹，台民首领吴汤兴、徐骧率义军奋勇抗击，大小数十战，互有伤亡。7月，姜绍祖在反攻新竹的战斗中壮烈牺牲。8月初，日寇陷苗栗，刘永福派吴彭年率黑旗军北上增援，与徐骧所部义军重创来犯之敌。8月底，日寇以优势兵力绕道偷袭义军后路。刘永福以黑旗军精锐“七星队”北上增援。在大肚溪、彰化等地与敌展开激战，吴汤兴、吴彭年力战而死。徐骧则退入阿里山区，组织高山族抗敌武装，并于9月发动了反攻彰化的战斗。

彰化失守以后，抗日义军力尽势孤。大陆同胞虽然群起要求支援保台战争，而清政府竟严令官民“不得丝毫接济台南”。刘永福派人回大陆请援，结果毫无所获。而外国商人拒用台南发行的官银票，市场贸易中止，抗日义军忍饥与敌人在彰化、嘉义一带作战。黑旗军守备王德标与义军首领徐骧先后战死。10月中旬，敌人陷凤山，围攻台南。刘永福在清廷的叛卖下孤立无援，束手无策，被迫乘船回至厦门。21日，台南陷敌。刘永福回到内地以后，曾署碶石镇总兵。晚年定居钦州。

[1] 据博白县东平《刘氏家谱》1925年抄本。

[2]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法战争》（一）。

[3] 唐景崧：《请纓日记》，见《中法战争》（二）。

[4] 唐炯：《戍山老人自编年谱》，见《中法战争》（二）。

[5]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

[6] 李建源、李旭：《黑旗军中的博白子弟》，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四集。

[7] 博白《冯氏族谱》，1991年修纂；又据冯子材孙女、钦州一中教师冯瑞娟的口述。

[8]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四《冯将军歌》。

[9] 参看《广西通史》第二卷第七章《民教冲突，反帝新潮》，以及1999年11月龙州水口乡调查采访。民国《龙津县志》第四编记载：游姓为龙州著姓，于宋、明、清来自山东和广东。民间传说游维翰祖辈于清初来自广东。

[10] 和为贵：《广西天主教史》，香港，1925年。

[11] 参看《刘永福之渡海援台》《刘永福之矢穷内渡》《刘永福等盟约书》；以及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俱见《中日战争》（六）。

三、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

甲午战争的失败，举世震惊，国人失望，群思有所变革。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非但没有如愿，还出现了维新志士被杀的悲剧。孙中山在甲午战争以后，深知请求之不可为，乃转而采取强迫手段，组织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虽然屡遭失败，但愈挫愈奋，终于辛亥革命之役推翻封建帝制，创建民主共和。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下，辛亥革命以后，反对专制、卖国，反对帝制复辟，维护民主共和，保卫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仍旧是中国人民奋斗的主题。其中有不少广西客家儿女的参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同盟会中的广西客家人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以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联合，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这一年，同盟会的黄兴到了桂林，在新军中秘密建立革命组织，时为新军营长、年仅19岁的林虎，参加了这个组织。

林虎（1886-1960年），原名荫清。祖籍陆川县良田乡石垌村。父林寿堂是个秀才，在驻百色的清军中任文职幕僚。1886年，林虎生于百色厅驻地。[1]少年时随父亲到江西南昌。15岁考入江西武备学堂，与李烈钧同学。临毕业时，因路遇流氓调戏妇女，奋起痛殴流氓，反遭学堂处罚，愤然离开了学校，转入江西常备军统领郭人漳部为营见习官。1905年，随郭人漳调广西，以成绩优异升为营长。未久，经黄兴发动加入同盟会。黄兴以“荫清”之名与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旨相悖，而且林虎生就一付虎相，乃建议改名林虎，别字隐清。辛亥革命前率军随郭人漳驻扎钦廉、防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奉命率所部开往南京，与黄兴所率的卫队模范营合编为警卫混战团，以林虎为团长。后随江西都督至南昌，升任江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事发，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林虎随李烈钧任讨袁军左翼司令，据守马当、湖口、九江各要塞，坚决抵抗袁军的攻击。1915年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以后，林虎从国外回到南宁，积极策动陆荣廷桂系转向讨袁，并任两广护国军第六军军长，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从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年轻的林虎在争取民主、维护共和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2]

在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号召下，不少广西客家儿女直接参加了辛亥武装起义。李德山、刘古香、徐启祥和卢殿林，就是他们的代表者。

李德山（1868-1911年），桂平人。自幼喜习拳棒，是远近知名的拳师。17岁投入清军，

在中法战争中负伤。战后被裁。愤清廷无道，加入三点会。1903年，策划攻柳州事泄，化名谭三，携眷避居罗城龙岸乡。此后多次密谋起义，皆告失败。1907年，经张铁臣、刘古香介绍，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在柳州创设樟脑公司和华熙客栈，作为联络机关。德山经常往来于柳州和广州各地。1910年初，南下广州，联络新军同志密谋起义，事为清廷探悉，乃回平南丹竹都兴村义兄弟韦玉卿家，开拳馆教青年习武。都兴韦氏与桂平金田韦氏同宗共祖，都是客家人。^[3]1911年初，黄兴奉孙中山之命，至香港成立机关，联合各方志士到广州密谋大举。李德山闻讯，立即在平南召集精壮20人，于4月中旬分批赶往广州。其中有客家青年韦统淮、韦统铃、韦荣初、韦树模等人。因革命机关被敌人破坏，革命党人决定提前于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午后5时30分，黄兴发起进攻命令，李德山率同志担任先锋，从小东营直冲两广总督衙门。总督张鸣岐穿越后墙逃走，而大批清军迅速包围督署。李德山率队转入小北门高阳里，占领源盛米店，以米包筑垒作掩护，血战一昼夜。韦统淮、韦统铃、韦荣初和韦树模英勇战死。敌人火焚米店，德山在突围时腮部中弹被俘。临刑时，厉声斥敌明志曰：“大丈夫为国牺牲，是分内事，岂似汝等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而后慷慨就义。后葬广州黄花岗。^[4]在黄花岗的72位烈士中，至少有5位是广西客家的热血男儿。

刘古香（1869-1913年），原名起今。柳江县西鹤乡人。喜习古今兵法，读书过目不忘。清庚子、辛丑（1900-1901年）并科举人。1906年入广东虎门将弁学堂，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第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奉派回柳州，以办学为掩护，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08年，建立柳州同盟会，先后加盟者有李德山、柯汉资、谭昌、周毅夫、刘震寰、柯禹臣等20余人，其中多军、政、学各界人物。两年之间，两度发动会党及新军密谋在柳州举事，皆以军机不密而失败。1910年冬，黄兴、赵声等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组织起义，计划选拔精壮骨干八百人为“先锋”（敢死队），分十路进攻广州，然后大举北伐。刘古香奉命召集广西同志李德山等20余人入广州，以旧仓巷扶榕里四号为机关。1911年4月27日因起义消息走漏，在队伍尚未依计划集中的情况下，仓促分四路出击。刘古香率领广西同志至小东营总机关集中，在黄兴的亲自带领下，疾趋两广总督衙门，尽歼其守卫。两广总督张鸣岐闻讯，穿越后墙逃走。而水师提督李准率兵由归德门来援，先后在太平街口和高第街发生激战。晚10时左右，起义军因弹尽无援，寡难敌众，遂分路向大南门、大东门冲出，乘小艇渡过河南。刘古香转乘轮船出香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刘古香与姚雨平奉胡汉民之命，入广州布置新军响应。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刘古香为都督府秘书长。而10月12日，柳州即被革命党人武力光复，成立军政分府，公推刘古香为府长，并先后迫使宜山、融县官兵反正。两广宣布独立以后，刘古香出任广西右江水陆军统领。1913年夏，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刘古香响应孙中山的“讨袁”号召，于8月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响应办法。詎知卫队长刘士雄于9月11日发动兵变。12日，刘古香与帮统刘震

震匆忙召开会议，宣布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背叛国家，决定柳州独立，推举刘震寰为讨袁军总司令，武力讨袁。陆荣廷则公开悬赏3万元捉拿刘古香。身为刘军督带的沈鸿英竟与陆暗通，于15日发动兵变，占据柳州，生俘刘古香。10月9日，陆荣廷从南宁至柳州，按照袁世凯“就地处决”的指示，在粤东会馆前将刘古香杀害。原柳州同盟会支部长，亲历“三·二九”广州起义，并在安庆参与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王冠三，以及刘军所部军官刘月卿、杨瑞池等亦同时遇害。^[5]

辛亥会攻浔州之战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广西以后，南宁、桂林、梧州各地的革命党人，多有以“劝说”的手段请求地方官绅响应革命的，但效果甚微。在平南、桂平、贺县等地，革命党人则立即发动武装起义，打击封建统治者。徐启祥和卢殿林，就是他们中的代表者。

徐启祥（1865-1936年），字先泰，桂平吉二里垌心村松竹堂（今木圭镇竹社村）客家人。父徐润生，在平南县城及上渡头分别开设米店、油坊，在桂平江口圩开平码行，至启祥持家时，已为地方巨富。卢殿林（1879-1948年），又名琮恩，平南安怀乡谷塘村客家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16岁至桂林学习，第二年即回家乡，后转往香港，与徐启祥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即奉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联袂回乡，以探矿和经商为名，分别在县城朱衣巷和恒丰米店设立机关。启祥变卖田产得谷20余万斤，作为联络同志、购买武器、开展革命工作的经费。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启祥担任联络和后勤供应工作。起义失败后转往香港。未久，即秘密回乡与殿林会合。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他们立即与罗佩珩、黄熊祥等30多人，在恒丰米店举行会议，并分路往东平、鹏化、大桂山等地策动会党、绿林和团练势力，组成千人的起义武装，在徐启祥的统一指挥下，依原定先取平南，再攻浔州的作战方案，于11月5日分兵四路，会攻平南县城。知县蹇先桃弃城逃走，革命党人进城后，以卢殿林摄理县政。同时会合各方力量，分三路溯江而上，西进浔州。9日，各地义军合计万人会攻府城。知府贺清源闭城顽抗。而原为清广西提督、此时已经掌握广西实权的副都督陆荣廷，一面派兵攻击民军，一面以官禄分化革命党中的重要人物罗佩珩。会攻浔州迅速失败。徐启祥、卢殿林返回平南。民国建立以后，徐启祥以针医济世，并办学作育人才，深受乡人的赞评。^[6]

在要求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斗争中，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夜的钦州、防城、上思起义，永淳、怀远等地抗捐税斗争，以及武昌起义后，柳州、融县和贺县等地的“反正独立”，也都有不少客家民众参与。作为贺县会党一方首领的黄十二、邱茂英、邱怀信等人，还因为响应起义而惨遭杀害。^[7]

当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讨伐陆荣廷割据地方的时候，贺县沙田乡龙井村的张氏家族，有十几位青年投入了革命军，其中张廷策任陆军中尉、孙中山的卫士排长，张廷

言为陆军中尉、护国军手枪队队长，张廷对、张廷炯和张廷璿分别任陆军上尉、上尉连长或副营长，张廷曦、张廷焯、张家立、张家意和张肇曜皆任陆军少尉，张廷平则为少尉骑兵排长。一个家庭，叔侄兄弟 13 人共同追随孙中山，为争取民主共和而战，在乡邻中传为佳话。^[8]

逆时代潮流而动者

也有的客家人，为了一家一派的私利，与民主共和背道而驰，表现极坏。沈鸿英和陈炳焜，就是此类人物的代表者。

沈鸿英，原名亚英，号冠南。原籍广东恩平，因家境贫寒，迁居广西雒容，投身绿林。他为人剽悍狡诈，善于投机逢迎。辛亥革命柳州宣布独立以后，他投入刘古香、刘震寰军中，由管带升为督带。1913 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事发，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刘古香、刘震寰在柳州响应反袁，沈鸿英竟诱捕刘古香，交与陆荣廷，按照袁世凯的指示就地杀害。从此转投陆荣廷，先后在桂东和广东的钦州、广州、高州、雷州以及韶州各地，为陆荣廷桂系排除异己，扩张势力效劳，成为陆荣廷桂系的重要人物。此后，他拥兵自重，以一派之利为依归，摇摆于桂系陆荣廷、北洋系吴佩孚和革命派孙中山之间，借机扩张势力，聚敛钱财，无恶不作。1925 年败归广西，被后起的李宗仁、黄绍兹桂系彻底打败，化装潜逃香港。1938 年因病死去。^[9]

陈炳焜（1868—1927 年），字舜琴，马平县阳和村（今属柳江县）人。生于破落的仕宦之家。幼年曾入私塾读书。1885 年，17 岁的陈炳焜远走龙州，在提督衙门当卫士，后入统领马盛治镇南营任事。1894 年，陆荣廷受苏元春招安，在马盛治部任管带，从此陈炳焜与陆荣廷结识并结为把兄弟。在镇压游勇、打败陆亚发兵变和革命党人的镇南关起义中屡立“战功”。辛亥革命广西独立以后，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以陈炳焜为军政司司长。1913 年“二次革命”爆发，陈炳焜在陆荣廷、袁世凯指使下，杀害辛亥武昌起义元勋蒋翎武于桂林；继又派兵进攻柳州，刘古香惨遭杀害。1915 年，通过反袁复辟帝制，桂系势力扩及两广。1917 年春，陈炳焜出任广东督军，极力抵制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并乘机在广东包庇烟赌，贪污勒索，大饱私囊，因此受到陆荣廷的忌妒。1920 年，孙中山率师驱逐桂系，陈炳焜虽欲以广西护军使之名纠众重据广东，但 1921 年孙中山出师讨桂，桂系势力土崩瓦解，陈炳焜先是携家逃往天津，不久又迁居香港，常以吸毒打发时日。终因生活拮据，于 1926 年返回柳州，第二年因病死去。^[10]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民主共和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当时中国真正的民主共和，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

[1] 林虎自言出生于万岗县。万岗县乃民国建置。清代为百色斤、东兰州和凤山土州地，今为巴马瑶族自治县。

[2] 林虎：《往事片断》，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一辑；《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见《广西文史资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第十期。

[3] 参看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附录《金田采访记》；李毓麟、黄湛恩：《从韦氏族谱看韦昌辉的祖籍及民族成分》，见《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4] 参看岑建英：《李德山烈士》，见《广西文史资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第十期；新编《桂县志》第二十八编《人物》第一章《革命烈士》；新编《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志》第二十四篇《人物》第一章《传略·革命烈士》。

[5] 参看刘立道：《刘古香》，见《民国广西人物传》（一）；钱权：《刘古香烈士》；阚轸安等：《辛亥革命在柳州》；龙小凤：《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琐记》；俱见《广西文史资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第十期；新编《柳江县志》第二十六篇《人物·革命烈士·刘古香》。

[6] 新编《平南县志·人物篇》第二章《历史人物传略》；潘乃德：《平南起义和会攻浔州》，见《广西文史资料·纪念辛亥革命专辑》第十期。

[7] 梁培英：《贺县志》第一编《前事》。

[8] 张焕忠等编：贺县《龙井张族的由来及其发展》，1998年。

[9] 黄秀颖：《沈鸿英》，见《民国广西人物传》（一）；龙小凤：《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琐记》，见《广西文史资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第十期。

[10] 刘立道：《陈炳焜》，见广西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民国广西人物传》（四）。

四、从五四运动到十年内战

20世纪20年代的广西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新觉醒。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同年10月孙中山出巡广西，整军北伐，并于12月经共产党员张太雷的介绍，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晤，孕育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地方组织逐步建立起来，工农运动广泛开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共和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但是，自从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广西处于军阀的统治之下，社会动荡不安。据统计，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年，省政主持人的更动不下20次之多，平均每年更换一次。1921年陆荣廷桂系垮台以后，出现了所谓“自治军”的纷争，广西各地，“司令满街走，将军多如狗；杀人又越货，无时不干戈”。广西陷入无政府、无法无天的局面。^[1]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大革命运动，举行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不少客家青年投入斗争的行列，发挥了革命先锋的作用，受到世人的尊敬。

广西早期的客家中共党员

宁培英（1901—1928年），又名宁楚珍，参加革命以后，化名林平生和凌秋珍。陆川县沙坡白马村人。在陆川中学学习期间，即被推举为学生会会长。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陆川，他立即组织同学上街示威游行，发表演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现了良好的组织能力，深受师友们的赞扬。1922年，宁培英转往广州，进入广东政法学院学习，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五卅”运动和香

港工人大罢工相继爆发，宁培英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行列。他组织并领导了“广西留穗学生会”、“广西革命青年社”和“陆川青年社”等爱国团体，同时兼任《陆川青年》和《郁林五属留穗学生会杂志》的编辑，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就在这一年，25岁的宁培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陆川第一个共产党员。1924年，广西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宁培英奉组织之命回桂，先后出任广西国民党农民部干事和农民讲习所讲师，并与林培斌在浔州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平南新隆苏维埃政权，任中共党支部组织委员和农民自卫军政治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宁培英转任中共广东省委广西梧州地委委员，并在大安圩以经商和开办印刷厂为掩护，兼以筹措革命经费。1928年1月，宁培英领导了著名的新隆“劳五暴动”，以赤卫军30余人与敌人对战三昼夜，据守的房屋被烧毁，退入附近的寺庙中继续战斗，庙宇被炸塌，宁培英受伤被捕，英勇就义。^[2]

朱锡昂（1887—1929年），字识惺。光绪十三年（1887年）4月生于博白沙河上垌屯。父亲是个乡村教师，因此，朱锡昂从小即可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郁林直隶州试中为秀才。两年后，清廷下诏废除科举，朱锡昂转习新学。1907年考入广东高等工业学堂。当时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已在香港、广州各地广泛传播。1911年初，朱锡昂经人介绍，以“拭生”之名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并参加了广州“三·二九”起义。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到广西，先后担任了郁林五属教育团副团长、郁林五属中学校长、广西省参议员、南宁府中学校长、怀集县中学校长、广东郁南县知事以及广西省议会秘书长等职。1924年11月，在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人多有接触。1925年春，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任郁林省立中学校长的朱锡昂，以郁林各界后援会会长的名义，发动群众声援上海和省港工人的斗争，同时积极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1927年，朱锡昂参加了广州起义。第二年1月，奉命再回广西。6月，在贵县举行的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广西特委书记。9月，广西特委改为临时省委，被推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他抓住蒋桂战争的有利时机，在郁林五属积极发展劳农会和农民赤卫军，加紧革命暴动的准备。1929年5月，劳农会员迅速发展至4000余人，农民赤卫军亦有500人枪以上。朱锡昂在郁林新桥乡榕树根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于端午节之夜举行革命暴动，围攻郁林城，成立郁林五属农民赤卫军和苏维埃政府。会后，朱锡昂即派张第杰专程赶往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请示汇报，而朱锡昂与郁林县委书记王懿仁、委员张震球等亦分赴各区进行部署。6月2日朱锡昂与王懿仁返回榕树根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包围。王懿仁冒死冲出重围，朱锡昂则在突围时被捕。8日晚，朱锡昂在郁林厉声斥敌后英勇就义，时年42岁。朱锡昂从前清秀才到共产主义战士，体现了与时俱进、勇往直前的可贵精神。^[3]

邓无畏（1900—1931年），原名邓其寿，又名邓权、邓恒若。祖籍广东嘉应州，其先祖为了谋生，从广东迁入广西，定居怀远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1917年，17岁的邓无畏

即远离家乡，投入刘震寰部为兵。他为人机警，勇于负责，深得上司器重。1921年奉命率部入都安，追剿陆荣廷、林俊廷残部。第二年，积功晋升营长，随覃有松团进驻广州。1924年初，经覃有松介绍，与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韦拔群、陈伯民等结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久，因刘震寰部发生变故，邓无畏与覃友松同回广西，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在都安夷江、拉烈等地组织农民自卫团。11月，以邓恒若之名前往东兰，在韦拔群主办的第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工作结束后再回都安，在中和村组织了第一个农民协会。为了鼓励妇女参加革命，他在镇江常谷村召开的两千人群众大会上，题写了“挥尔额中汗，疗尔腹中饥，尽尔十指能，织尔身上衣”的诗句。1926年，韦拔群在东兰武篆育才小学再度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无畏又应邀前往，先后担任第二期讲习班教员和第三期讲习班副主任，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随又回到都安，和覃道平等在大部分乡村建立农会和农民赤卫军，邓无畏任都安农民协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无畏与陈伯民、陈鼓涛等转移东区拉烈乡，继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赤卫军，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坚决斗争。12月，敌人指名悬赏通缉韦拔群、邓无畏等24人。邓无畏被迫撤离都安。1931年，在武宣开展兵运时被敌人杀害。^[4]

黄士韬（1899—1927年），又名韩略。祖籍广东丰顺县。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其先祖黄威和为了易地谋生，迁居广西贺县永庆乡莲塘村（今莲塘乡新莲村）。经过3代人的努力，士韬诞生时，黄家已是一个富裕的书香之家。1906年，士韬入本村私塾读书。1912年民国建立，他考取贺县高等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毕业以后，负笈广东，考入德国人主办的广东梅县乐育中学学习。他通过接触进步知识分子，学习新的知识，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问题，萌发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1919年，20岁的黄士韬走出国门，赴法国勤工俭学。临行之前，他给上海华法教育分会写信，表示了努力研究哲理，以期对社会有所贡献，以尽人民义务的志向。留法一年之后，转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不久，经周恩来、熊锐的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青年团旅比支部的工作，与周恩来、赵世炎、聂荣臻等一起研究社会主义学说，讨论中国社会问题，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不久，奉中共旅欧支部选送，转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深造。1926年冬回国，先后在上海、广州和武汉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广西的党组织遭受破坏。中共广东区工作委员会派黄士韬回桂，负责恢复梧州的党组织，参加组建中共广西特委，被任为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他和特委书记廖梦樵分析形势，制定工作策略，逐步把各地遭受破坏的组织重新建立，把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联系起来，并且决定在中秋之夜举行西江轮渡船务总罢工，调动各地农军开往梧州，策应叶挺、贺龙率军南下广州，以便大举。不幸被叛徒李天和告密，黄士韬和廖梦樵同时被捕。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黄士韬始终坚贞不屈。1927年10月19日，

在梧州盖山英勇就义。^[5]

贵县桥圩的杨瞻（1904—1934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用杨柳溪之名，以教育工作为掩护，在百色、宾阳、贵县和郁林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任百色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兼广西第一劳动中学校长。1930年11月随红军远征，任营政治教导员、军部地方工作科科长等职。同年12月在湖南武冈战斗中负伤，回乡治疗后转往上海与党组织联系，转入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不幸在征途中牺牲。^[6]

和桂南、桂中各地的农民运动相呼应，桂林之东的临桂大圩，在中共桂林县委东乡区委会的领导下，以客家聚族而居的毛村为据点，由黄居仁、黄志雄兄妹等组成的毛村支部具体负责，也积极发动农民，建立农会，组织农民武装，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准备举行千人的农民武装暴动。终因缺乏武器，且形势逆转而罢。^[7]

宁培英、朱锡昂、邓无畏、黄土韬和杨瞻等客家青年，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而他们的英名与精神却在人民的历史中永存。

[1] 广西省政府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1943年。

[2] 黄志荣主编：《陆川县志》第三十三篇《人物·烈士》。

[3] 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卷二十六《人物·革命烈士》；并参看《广西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4] 邵启俊主编：《都安瑶族自治县志》第三十二篇《人物》；并参有关党史资料。

[5] 唐择扶主编：《贺州市志》第三十一篇《人物·英烈·黄士韬》；钟声、唐择扶：《贺县客家人物·革命烈士黄士韬》，见《桂东客家人》。

[6] 罗甫琼主编：《贵港市志·人物志》一、《革命英烈·杨瞻》。

[7] 《中共桂林县委临时委员会的成立》，见《中共桂林市党史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五、抗日战争

1931年9月18日，日寇在我国沈阳进行军事挑衅，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义战。1937年7月7日，日寇侵犯我国河北宛平城，制造了七七事变，开始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日救亡的高潮。8年之间，广西各族人民，其中包括广西的客家儿女，汇合到全民抗战的大潮中，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学生军和客家群众抗战组织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统治广西以后，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1936年4月，新桂系联合广东省主席、防城客家人陈济棠，发起逼蒋抗日的

“六·一”运动。从那时起，至1941年1月，广西先后建立了三届学生军，调动大批热血青年，在广西各地，或开赴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前线，为宣传和组织群众，抵抗日寇侵略，做了大量工作。广西客家儿女参加学生军的不少。如黎琦清又名洁霜（1918—1949年）、黎琦新又名辛奇（1920—1940年）为同胞姊妹，苍梧县林水镇林水村人，出生于富裕家庭。她们在梧州初中读书时，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阅读进步书刊，激发了革命爱国的思想。1936年，黎琦清参加了第一届广西学生军。第二年，黎琦新参加了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并且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黎琦新随学生军开赴鄂、豫、皖抗日前线，为抗日部队护理伤员和演出文艺节目。同年8月，随团回家乡汇报战地消息。而后根据组织指示重返前线，任安徽省妇女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开展抗战动员和统战工作。1939年10月，率学生军到无为县宣传抗日救亡。第二年1月，为了反击国民党在皖东掀起的反共高潮，黎琦新奉命转移至新四军游击司令部驻地开城桥。当敌人宣布在无为县戒严妄图进行破坏时，黎琦新巧妙地帮助县委和青委的10多名同志以及重要文件安全转移，黎琦新亦安全转至来安县，担任中共来安县屯仓区委组织委员。1940年7月1日，屯仓区地主武装发动暴乱，黎琦新不幸被敌人捕杀。牺牲时年仅21岁。

黎琦清参加学生军以后，又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广西大学读书会”，投身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的斗争。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黎琦清随其兄往香港，筹办抗日报刊，与爱国青年王振华相识、相恋。第二年，黎琦清回贵县中学任教，王振华人川任《新蜀报》记者。1941年，黎琦清考进四川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习。12月，王振华因坚持抗日主张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抄家时发现黎琦清的照片和书信。面临特务的拘捕，她镇定自若，决心与王振华共患难，同生死。两人先被关进重庆国民党兵工署监狱，后被转移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6年7月，他俩又被押解至重庆白公馆监狱。患难相依多年的情侣在狱中结为伉俪，并且生下两个儿子。在关押的多年中，他们始终严词拒绝敌人的威胁利诱。黎琦清虽然不是党员，却在狱中与共产党员张露萍、车耀先、罗广斌、陈然等结成亲密战友，并尽可能为他们互通讯息服务。1949年11月，他们和监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300多名革命者惨遭杀害。临刑时，黎琦清夫妇怀抱婴儿，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家四口，同时倒在血泊中。1983年10月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振华、黎琦清为革命烈士，11月27日，重庆各界人士在烈士墓前举行了纪念大会。^[1]

抗日战争期间，广西学生军奔赴前线担任战地宣传和服务工作，或直接参加战斗的还有很多。其中以广西大学学生、博白客家青年李锡贡率领的20名男女学生军小分队，风雨兼程，历尽艰辛，从广西赶往河南潢川，在第五战区司令部直接领导下工作，受到了刚从台儿庄和徐州会战归来的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赞赏。^[2]

抗战爆发之初，在桂南客家地区，各种抗日救国会、抗日后援会、抗日后备队等群众抗战团体迅速组织起来。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广州、武汉以后，陆川年轻的中共党员林克武即通过各种关系，争取郁林区民团副指挥官兼陆川县长萧道龙的支持，建立陆川战时工作团，由萧道龙兼任团长，民团指挥部驻陆川政治辅导员李耿为副团长，林克武为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这个由客家人掌握的战工团，其成员遍及全县14个乡和陆川中学，总人数“三千以上”。与此同时或稍后，兴业、博白、北流、郁林、贵县、桂平以及合浦各县，也分别成立了各种战时工作团。其中有不少客家青年男女，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则是各地的中共党员。他们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大造全民抗战的声势；发动群众捐钱捐物，支持前线；开展群众性的查禁走私活动，临战前则实行坚壁清野，对敌开展经济斗争；建立抗日自卫武装，随时打击侵略者，消灭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战工团为群众抗战发挥了政治向导作用，成为保乡卫国组织的坚强支柱。

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妇女和儿童得到战工团和学生军的帮助，也纷纷动员起来，组织妇女游击队或战时儿童工作队。陆川县是客家大县，县南的西稔乡则是发动组织妇女游击队的策源地。由于乡中的妇女多和学生军的女战士交友认亲，所以在她们的帮助下，3天之间，即自己筹集活动经费，组成一支140多人的妇女游击队。她们身穿灰布军装，腰扎皮带，请学生军担任队长、指导员和教练员，同过集体生活，接受军事训练，随时负责执行上级布置的各种任务。在她们的带动下，米冲、山口、陆城和北流县的新圩等地，也建立了110多人至数十人不等的妇女游击队，同样是自筹经费，全副武装，集体操练。贵县则集中了50余名优秀学童，于1939年12月成立战时儿童工作队。她们虽然无缘直接参与对敌作战，但日常的站岗放哨，严防敌人破坏，维护社会治安等，却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大家把妇女游击队赞为“木兰转世”。^[3]人民群众组织的抗日自卫队，更是遍及全省各县城乡，随时反击来犯之敌。平南大鹏和桂平垌心、紫荆山区，以客家人为主力建立的抗日自卫队，于1945年2月联合围攻盘踞在桂平大宣圩的日本强盗，仅用了15分钟，就攻破了敌人顽抗的据点吴氏宗祠，歼灭敌军10余名，残敌狼狈逃往大湟江口，自卫队阵亡张石党、张廷模等4人。^[4]

群众的动员、组织和战斗，离不开党的领导。贵县客家青年陈岸（原名杨善安），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即在贵县、郁林等地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并先后任中共贵县县委、中共广西特委和郁江特委的领导工作。1932年，中共郁林特委遭敌人破坏以后，在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艰难时期，他孤军奋战，深入郁林五属及周邻各县发动群众，组织劳农会，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从1936年11月新的中共广西工委成立，至1939年12月往延安出席中共“七大”，他先后3次担任中共广西省工委的领导工作，为发动和组织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5]

文学艺术战线上的客家青年

在文化艺术战线，客家青年周钢鸣、秦似等在宣传抗日、建设战时文化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钢鸣（1909—1981年），原名周刚明，笔名周达、康敏。生于罗城龙岸乡一个小商贩之家。幼年读过5年私塾，15岁离家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往上海。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大美晚报》《生活知识》等刊物的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广州协助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日报》。1938年广州危急，报馆迁桂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周钢鸣除了负责《救亡日报》的记者与编辑工作外，还主编《人世间》杂志，并经常参加桂林艺术界的各种活动。1939年春，周钢鸣调广西地方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编刊股股长和中共地下党省外党员支部书记，直接在李克农同志领导下，协助进步人士杨东莼开展工作，把学校办成青年追求进步、人称南方“抗大”的干部学校。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广西地方干校被迫停办，周钢鸣也离开学校。周钢鸣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评论家，他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诗歌和论著。他的《抗日救亡曲》，唱遍了大江南北；他的《怎样写报告文学》，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专著，曾被延安“抗大”用作教材。作为职业革命家，他自觉地做群众工作，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6]

秦似（1917—1986年），原名王辑和，又名王扬，小名阿水；笔名甚多，有王砚新、徐曼、姜一等；生于博白县歧山坡村。1932年在中学读书时，即以水生笔名，在郁林《民国日报》副刊发表散文作品。1937年考入广西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学习，并主编香港《循环日报》的《文学》双月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回乡为三联书店办中转业务，有缘读到鲁迅的不少作品，开始写作杂文。1940年初，开始以“秦似”笔名给桂林《救亡日报》投稿，得到夏衍的赏识。不久来到桂林，在夏衍、聂绀弩等人的支持下，于8月创办了杂文刊物《野草》。从此时至1943年4月被迫停刊，秦似始终是这个刊物的操办者和撰稿人。《野草》歌颂反法西斯战争，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为民主、公正呐喊的战斗风格，得到郭沫若、茅盾、夏衍、柳亚子等人的赞赏和支持。在办刊、写作的同时，秦似还独自或与他人合作，翻译了不少苏联、美国等外国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并与他人合办了《文学译报》杂志，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有益的工作。由于秦似在抗战文化工作中的贡献，他和周钢鸣同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并在1944年春的西南剧展中参加剧评工作。同年4月，担任广西省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秘书，直至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出第二道紧急疏散令时，他才于8月9日挤上疏散难民的火车，转往桂东南，参加敌后抗日工作。^[7]

捍卫祖国神圣领空的英烈

在捍卫祖国神圣领空的战斗中，黄莺、李膺勋、吕天龙等客家青年立下了赫赫战功。

黄莺（1911—1938年），乳名老孜，取名黄廓，字允拓。祖籍广东嘉应州丰顺县，后迁广西宜山县板冷乡永仁村（今属都安瑶族自治县）。黄莺7岁随父读书，少年时即挥笔书写“欲图救国苦读书”以自勉。1927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宜山省立第十一中学，毕业后在闲存小学任教。1931年考入广西大学预科习化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报国心切，考入中央军校南宁第一分校附设的童子军训练所。1934年6月，改名黄莺，考入广西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毕业后留校任飞行助教。1937年7月，日寇犯我河北宛平城，抗日战争爆发，广西航空学校飞行教导第一大队改编为航空委员会第三大队第七、第八两个驱逐中队，黄莺在第八中队，奉命进驻河南信阳。在集训和备战过程中，他建议改进飞机操纵设备，加装坐舱防弹钢板，对提高战机性能和空战防卫起到良好作用。1938年3月25日，我第三大队战机40余架飞往台儿庄，协同地面部队作战。返航时在河南商丘上空与敌机50余架相遇，一举击落敌机7架，其中黄莺击落2架。4月10日，我机在商丘上空再度与敌人机群相遇，黄莺驾机在高空发现友机受敌机攻击，他再逞神威，俯冲敌机，以四挺机枪向敌机猛击，又将敌机两架击落，并毙敌酋加藤大佐。7月18日10时许，大队长陆光球率黄莺等僚机4架，从江西樟树起飞，与苏联志愿机队会合，在南昌上空与敌机群发生激战。苏机领队巴比洛夫上校陷入敌人重围。黄莺驾机冲前援救，不幸被尾追的敌机击中，壮烈牺牲。巴比洛夫对黄莺的救助十分感激，请求中央政府为黄莺厚葬，并优抚家属。黄莺的灵柩从汉口移回宜山时，岳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各地群众皆设灵路祭，宜山县各界人士千余人隆重公祭后，将忠骸葬于龙江公园。蒋中正题“碧血忠魂”碑表彰烈士。^[8]

李膺勋（1910—1938年），陆川滩面乡上旺村人。李膺勋先后在陆川中学、郁林省立九中学习，毕业后考入暨南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北，膺勋深感国难严重，决然投笔从戎。1932年考入广西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班，1934年7月毕业。10月，奉派往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第二年回国，任广西航空学校飞行教员。1936年8月转任广西空军驱逐机队分队长。1937年8月，编入中国空军第三大队。9月，集中兰州训练并接受苏联战机，然后回驻湖北孝感。1938年初，驾机参加台儿庄会战，而后与第七中队队长吕天龙配合，驾机攻击枣庄、峄县敌人阵地，摧毁敌坦克数十辆，毙伤敌人千余人。3月25日，李膺勋抱病驾机参加鲁南战斗，返航时在牧马集上空与敌机相遇，我战机14架与敌机24架展开激战，击落敌机4架后，吕天龙负伤迫降，李膺勋战机被敌机击中起火，壮烈以身殉国。1987年2月18日，人民政府追认李膺勋为抗日烈士。^[9]

吕天龙（1910—1972年），祖籍广西陆川县。其父吕云山，因家境贫困，20岁即被“卖猪仔”骗到南洋，在印尼邦加岛锡矿做工，40岁结婚成家，生天龙兄妹二人。天龙7岁

丧父。13岁，辞别母亲回国学习，高中毕业时又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天龙兄妹举目无亲，被迫辍学，出国自谋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犯沈阳，天龙报国心切，奔回祖国，考入广西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班。因学习勤奋，技术优秀，与同学李膺勋等4人被送往日本明野战斗飞行学校深造。回国后任驱逐机队主任教官，不久，升任驱逐飞行队长。1937年抗战军兴，广西空军编入中央建制，天龙任空军第三大队第七中队队长。奉命北上西安、兰州，接受苏制驱逐机，然后进驻湖北孝感。1938年初，先后与敌人在襄樊、武汉上空发生激战。3月，台儿庄战役全面展开，天龙三次率机协同地面部队作战。18日，在大队长吴汝鏊的率领下，天龙中队出击峰县、滕县敌人阵地，并在临城上空一举击落敌机3架，全胜归航。25日，再次随吴汝鏊大队长率战机出击枣庄、临城之敌，返航至归德上空，再次与敌机群相遇，又击落敌机7架。4月10日凌晨，吕天龙率机队掩护我轰炸机猛袭枣庄、峰县敌军，摧毁敌军司令部及坦克数十辆，返航时在禹城上空与敌机群发生激战，天龙与敌机3架激烈交锋，右手及左腿3处中弹负伤，迫降时神智已近昏迷。医治经年，伤愈后在兰州、伊宁、昆明等地担任空军驱逐机训练工作。1941年3月调成都任空军第五大队长。是时因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强令空军避战，幻想保存实力。6月，敌机来袭，实际负责的总部参谋指挥失误，全部战机在水机场被敌人击毁。当时因病请假的吕天龙和战友张友谷、余平想3人竟被诬有罪，冤狱3年。出狱后虽被派往英国学习航空教育，却饱受蒋家嫡系势力的排斥。1949年8月，吕天龙在香港经中共地下党的介绍，重归祖国，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0]

客家侨领李光前

广大海外华侨关心家乡建设，心系祖国安危，天涯海角，同心同德。印尼华侨李光前，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生于博白县城厢乡新仲村，客家人。辛亥革命前夕入桂林优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旅居印尼，先在邦加岛锡矿从事教育工作。数年后辞教经商，并集股创办振和昌公司，经营橡胶与胡椒种植。因事业有成，被举为勿里洋中华商会会长、中华会馆董事长和中华学校董事会主席。他致富不忘家乡，1919年回乡捐资创办博白图书馆，并资助博白留穗、留沪青年创办革命刊物《南流潮》和《新博白》。1931年九一八和1932年“一·二八”日寇侵略中国，国难当前，他立即在华侨中宣传抗日救国，并带头捐资捐物，运回国内，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坚持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勿里洋华侨在他的动员下，于1936年把一辆有红十字标志的汽车送到延安。1942年日寇占领印尼以后，李光前在侨胞中组织“抗日会”与敌人展开斗争。1945年不幸被敌人逮捕，解至苏门答腊砧碑监禁，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同年2月18日被敌人杀害，终年54岁。抗战胜利以后，政府追认他为抗日救国烈士。^[11]

人民群众是制胜的主力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坚持专制独裁的立场，进而挑起反人民的内战。在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广西的客家儿女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了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战斗。不少客家青年，如合浦的张世聪，陆川的吕珂、黄柳玲（女）、李英奎、朱为流、刘敦化、罗培英，博白的李隆、邹瑜、邹杏，蒙山的钟文综等，他们多是投笔从戎，远离家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转战在全国各个战场、各条战线上。在省内，许多客家男女在桂南、桂中、桂西和桂东北各地，投入了建立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和桂系集团反动统治的斗争，直至接应解放大军南下，实现广西的全部解放。

人民群众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主力军，也是争取全国解放和保卫人民民主新中国的主力军。在事关国家命运、民族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人民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也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让我们仍以博白、陆川两个客家大县为例。

博白县 抗日战争阵亡烈士 406 名，解放战争牺牲烈士 118 名，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烈士 153 名。在所有的烈士中，60%以上是客家儿女。

陆川县 抗日战争阵亡烈士 321 名，解放战争牺牲烈士 62 名，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烈士 97 名。在所有烈士中，65%以上是客家儿女。^[12]

人民对国家、民族的牺牲和奉献，博白、陆川如此，其他地区也就可以想见了。人民是伟大的。

[1] 据陈云枢主编：《苍梧县志》第三十一篇《人物·革命烈士·黎琦新、黎洁霜》。

[2] 请参《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军事篇》第五章《广西学生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3] 关于战工团、妇女游击队和战时儿童团的历史，主要参考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党在广西各地战工团》，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4] 郭子明主编：《平南县志·军事篇》第三章《主要兵事》。

[5] 参看陈岸：《我的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6] 潘克慕主编：《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志》第二十四编《人物·历史名人·周钢鸣》；丘振声：《周钢鸣》，见《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

[7] 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卷二十六《人物·历代名人·秦似》；李建平：《秦似》，见《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

[8] 韦甘睦主编：《宜州市志》第三十一篇《人物》；邵启俊主编：《都安瑶族自治县志》第三十二篇《人物》；梁奕《忆抗日殉国黄莺烈士》，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9] 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第三十三篇《人物·烈士传略》。

[10] 宗之瑛：《记爱国华侨吕天龙的飞行事迹》；江秀辉：《广西空军抗战散记九·吕天龙含冤入狱前后》，俱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广西航空史料专辑》第三十五期。

[11] 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第二十六卷《人物·历代名人》。

[12] 关于“抚战英烈”，据当年国家联合勤务司令部于1947年12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名录》。以及解放后广西省（区）、县民政部门公布的“烈士名录”统计，其余据省（区）、县民政部门公布的“烈士名录”统计，分见新编《博白县志》和《陆川县志》。

六、军政将领和科技精英

我们结合历史，讲述了近现代许多革命先辈的事迹，以及他们在反封建反帝斗争中的贡献。在此，让我们介绍在军政界和科技界做出不同贡献、具有重要影响的广西客家人。

国民党中的几位军政人物

廖磊（1890—1939年），原名梦祥，字燕农，又字元戎，号伯符。陆川清湖乡上坡村人。从17岁起，先后进入广西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和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入湘军唐生智部任职。辛亥革命时响应武昌起义，参加过孙中山于1921年的二次护法运动。1928年，在湘桂军阀混战中湘军战败，廖磊转投桂系，任桂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1年，带兵进驻东兰，围攻红七军韦拔群部。1934年秋，率桂军在桂北堵截红军北上。1937年抗日战争起，他率桂军第七军北上徐州，随又奉命南下，参加淞沪会战，与各路友军配合，痛击来犯之敌，挫败了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1938年11月，率军进驻皖南、浙西，兼任安徽省主席。他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各方进步人士，与共产党、新四军配合，打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11月23日，在指挥作战时突发脑溢血去世。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和叶挺等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去电悼念。^[1]

陈济棠（1890—1954年），字伯南。防城县河州垌望兴村（今属东兴镇）人。11岁时，随父迁至罗浮垌茅坡村（今马路镇茅坡村）。生于没落地主之家。少年读书，勤奋聪慧；争强好胜，向往军旅生活。1908年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经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以粤西钦、廉为基地，依违于桂、粤两系之间。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再举护法大旗，陈济棠从此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讨伐陈炯明、驱逐陆荣廷、实现两广统一的斗争中，陈济棠都立下了汗马功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陈济棠通过堵击叶挺、贺龙南昌起义军，打败张发奎、黄琪翔所谓“护党救国军”以后，凭借投靠蒋介石和利用蒋桂战争的机会，在蒋介石的摆布下，与陈铭枢分别掌握了广东的军权和政权。从此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斗中，摇摆于拥蒋与反蒋之间。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他扩大广东陆军编制，组建广东海军和空军；制定了在政治、经济、交通、文教方面建设广东的三年计划，为广东社会创造了一个短期安定繁荣的局面。他反对共产党。从1931年至1936年间，杀害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5000余人；但他对蒋介石出兵江西“剿共”的命令却阳奉阴违，并在1936年6月联合李宗仁桂系发动了逼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失败后被迫下野，以“考察”之名，游走于香港和欧洲各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从欧洲回国，虽然在政府中任职，而其基本态度是听从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始终无所作为。临解放时逃往台湾，虽被蒋介石政府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和国民大会代表等职务，但徒有虚名，无所作为。1954年11月因脑血栓病逝台北。^[2]

陈铭枢（1889—1965年），字真如，号一缘。合浦县曲樟乡璋嘉村岐山背人。父亲为前清秀才。因家道中落，铭枢13岁始入学堂读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与蒋光鼐、邓演达等同学。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不久即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转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学习。辛亥武昌起义时，陈铭枢与蒋光鼐、李章达等赶往武汉，编入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民国建立以后，他转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学习；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南下广州参加护国战争；反袁失败后东渡日本。1916年袁世凯败亡，陈铭枢始回保定军官学校复学，毕业后回广东，在地方部队任军职，开始了他近20年的军旅征战生涯。1923年初，他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响应孙中山北伐，攻克江西赣州后因部队出现分裂，乃辞职往南京探究佛学，改字真如；第二年冬回粤军任旅长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师长，转战粤西各属，驻军合浦。1926年7月，陈铭枢率师北伐，在攻打湖南醴陵、平山与湖北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中，和叶挺的独立团配合，所至多克，同享“铁军”的美名；同年冬，因功升第十一军军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铭枢先后出任广东省主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等职务，走的是随蒋反共的道路。1931年日寇侵犯沈阳以后，他与蔡廷锴等坚持主张反抗日寇侵略，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但因蒋介石的压制而屡遭失败。于是，他南下福建，和李济琛等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事败后出游欧洲和苏联，并以中国代表团团长名义，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抗战爆发后回国，因受蒋介石排斥，无缘领兵抗敌。1943年，陈铭枢与谭平山、杨杰、王昆仑等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1948年元旦，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临解放前夕，陈铭枢大力从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如浙江省主席陈仪、湖南省主席程潜、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的策反工作，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人民政法、农林、文教和国家和平统一事业，虽一度蒙受“反右”的冤枉，但仍常以国家的进步为喜。1965年5月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他在15日的座谈会上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3]

刘震寰（1890—1972年），原名瑞廷，字显臣（又作显承）。马平县（今柳江县）基隆村人。1906年入马邑两等小学读书，1909年考入桂林广西优级师范，第二年即离校南下广州。1911年经堂叔刘古香介绍加入同盟会，而后奉派回乡，联络柳州府属各县会党及绿林中人，颇得众心。辛亥武昌起义，柳州革命党人立起响应，武装进攻镇台衙门。清右江镇总兵陈宗棠“献印投降”，柳州军政分府成立，以刘古香为府长，刘震寰为民军第一支队司令。1913年刘古香改任广西巡防第五军统领，以刘震寰为帮统。9月，刘震寰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被陈炳焜击败，匆忙逃往香港；1917年回桂投靠陆荣廷，广西督军陈炳焜委他为巡防营副司令。1921年，孙中山出师“援桂讨陆”，刘震寰在梧州临阵倒戈，陆荣廷、陈炳焜狼狈逃走。刘震寰出任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不久，又与滇系唐继尧暗通，

对孙中山则阳奉阴违。1924年11月，孙中山因讨伐陈炯明，任命刘震寰为广西省长，遭到李宗仁等的反对。刘震寰为此远走昆明，与唐继尧密谋推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以后，刘震寰加紧和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等勾结，于6月在广州发动颠覆革命政府的叛乱。失败后他逃往香港，从此一蹶不振，以吸毒、嫖赌虚度岁月。抗日战争初期，回云南投靠龙云，受聘为云南省政府顾问，中央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昆明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抗战胜利以后回居香港，直至1972年病逝。^[4]

香翰屏（1889—1978年），别名桂珍，号墨林。其先世本姓查，后因故改查氏为香氏。浦北县石确乡坡子坪人。他9岁丧父，身材矮小，但胆略过人。20岁时，土匪数百人至村抢劫，他集族亲数十人奋起逐贼，从此名震乡里。1912年民国建立，他离乡往广州学习政法，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19年投笔从戎，考入护国军军官学堂，毕业后在海军任职，后转习陆军，在军旅中以军纪严整获好评。1925年8月，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职，数年后官至师长。1931年，在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任军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因蒋介石囚禁胡汉民，香翰屏甚为愤慨，乃在《二月军训》月刊发表洋洋1700余言的“驳斥蒋介石要电”，直斥蒋介石以莫须有之罪名加害胡汉民。然“开口曰党，闭口曰党，而其所作所为，无一不违背党章，破坏国法”，其人格之污贱，手段之卑劣，达于至极。国民固有之道德，尽为彼一人所断送，蒋介石不去，乱无已时。电文发出，国人称快。1933年9月，其随陈济棠率军在江西、广东“围剿”红军；第二年11月，因与陈济棠意见相左，被免去军职，直至1936年始回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同年11月改任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调任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率部在淞沪、苏浙等地抗击日寇侵略；1940年任国民党敌后游击队第三战区东江指挥所上将主任，1944年调任闽浙赣地区上将总司令；抗战胜利以后任广东行营、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秋移居香港，虽仍挂台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之名，但极少往来。1978年8月病逝香港。^[5]

以上介绍的几位国民党客家军政要员，他们在初起时都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或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也都能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抗敌救亡尽一份力量，这是应予肯定的。但他们在仕宦场中朝秦暮楚，反复多变，又常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这又是应予批判的。只有陈铭枢从1931年日寇侵占沈阳以后，即坚定地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体现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可贵精神。

共产党中的几位著名将领

共产党中的广西客家著名将领，可以朱光、李天佑、黄一平和钟夫翔为代表。

朱光（1906—1969年），原名光琛；博白县松山乡茂山屯人；出生仕宦之家；7岁丧母，11岁丧父。幼年的朱光虽然聪颖好学，但因家道中落，并不能过安定的生活。

1925年，19岁的朱光始入博白初中读书；第二年，因为带头驱逐反动校长的风潮被

开除学籍；同年秋，转入省立郁林二中读书。校长朱锡昂是共产党员，朱光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有缘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加工农和学生运动，并于是年冬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朱光被迫离校回乡，因此失去了团组织关系。不久，朱光转往广州，考入广州国民大学，重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随朱锡昂转往香港。

1928年初，朱光与朱锡昂受组织指派回到郁林，在各县恢复党团组织。同年夏，朱光受中共广西省委派遣前往上海汇报工作，随即转入上海艺术大学，以学生身份从事工人运动工作；两年之中因参加电车和商务印书馆工人的罢工，两次被敌人逮捕。无论在英租界捕房，或在龙华苏州监狱，朱光都坚贞不屈，并从此改朱光琛为朱光，得以不露身份。1931年春朱光出狱不久，即在上海转为中共党员；先在中共闸北区委工作，后任淞沪区特委书记，在工人和青年中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32年，日寇制造侵华的“一·二八”事变。蔡廷锴带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朱光参与组织“兰衣剧社”，开展募捐支前并到前线作慰问演出。

淞沪抗战因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而告终。同年夏，朱光奉组织派遣转往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随徐向前、陈昌浩等转战于鄂豫皖各地。1934年10月，朱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反被诬为“右派”“托陈取消派”，遭受残酷迫害，开除党籍，罚充苦役，历尽艰辛，随军抵达陕北。直至1936年11月在宁夏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大会上，朱光和廖承志等才获得取消处分，恢复党籍，结束了3年多的囚禁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朱光先后在中宣部、马列主义学院工作；1938年11月，随朱德总司令前往太行山，任朱德的秘书兼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朱总司令对他的评价是：“博学善谋，正直勤奋。”1940年春，朱光转调至八路军第一二九师1943部长，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1943年调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月，冀南军区并入冀鲁豫军区，朱光任合并后的军区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朱光奉命转往东北，先后出任中共嫩江省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西满军调部第36小组组长、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秘书长、长春市委书记等要职。在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发动群众，肃清匪特；培训干部，扩大党的组织和人民军队，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开国前夕，朱光奉命随军南下，接管广州。路经北平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对他慰勉有加。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朱光先后任广州军管会副主任、广州市副市长、市长，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对广州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以及城市的绿化和美化等都作出了贡献，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1961年2月，朱光调任国务院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副主任，曾带领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出访欧洲、亚洲、非洲10多个国家。他多才多艺，对戏剧、书法、绘画、诗词等造诣颇深，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1965年12月，朱光调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69年3月9日，在合肥含冤逝世。^[6]

李天佑（1914—1970年），临桂县六塘圩高波寨人。1914年1月8日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两年书塾，即因家贫辍学，随父母劳动谋生。

1928年，14岁的李天佑投入北伐名将李明瑞的独立团当兵；第二年10月随队伍从南宁开赴百色，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百色起义。李天佑任红七军军部特务连连长；在反击敌人的围追和挺进贵州的战斗中冲锋陷阵，身负枪伤；1930年4月进攻榕江之战，时任特务连连长的李天佑率精壮12人，冒死冲破敌人的防线，取得破城歼敌600余人、缴获大批弹药和筹得军饷数万元的大胜利；同年5月回师右江，在攻打马鞍山，克复百色、奉议、恩隆的战斗中，又两度负伤，仍坚守岗位，无所畏惧。

当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指导下，红七军奉命东进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11月，全军集中河池整编，随即向庆远前进。在攻打湖南武冈县城和广东乳源县梅花村的战斗中，李天佑的特务连始终冲锋在前，为全军开路。他虽然三度负伤，仍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抢渡乐昌河之役，全军被敌人截为两部。李天佑带领特务连紧随军长张云逸，掩护未能渡河的第58团和机关人员，北上坪石，抢渡武水，经桂东进入湘赣苏区，与红二十军胜利会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李天佑特务连参加了安福、宜黄、莲花等地的战斗。李天佑以勇敢善战，被全军赞誉为“小老虎连长”。

1931年7月，红七军划归红三军团建制。在一年的时间里，李天佑参加了保卫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转战江西、福建，先后在赣州、宜黄、连城和石城等地痛歼敌人，在战斗中被提升为红七军第58团副团长、团长，红三军团第5师13团团团长和第5师师长。他所带领的13团被授予“模范团”称号，他则荣获三等红星奖章。军团长彭德怀昵称19岁的李天佑为“小鬼”，赞赏他“年纪不大，指挥打仗还真有本事”。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李天佑率红5师任军团前卫。在突破湘江敌人封锁以后，于1935年1月转任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在军团参谋长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参加了攻克娄山关、遵义城，四渡赤水和四渡金沙江的战斗，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接任陕甘支队二纵队第10团团团长；11月直罗镇战役以后，任红一军团第2师副师长，第4师师长；先后参加了东征山西和西征陕甘宁的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李天佑任第115师343旅686团团团长。1937年9月，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痛歼敌板垣师团的战斗；第二年，任343旅副旅长，代理旅长，率部转战吕梁山区，参加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奉派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在延安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李天佑先后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第38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在四平、辽沈、天津以及渡江解放湖北的各大战役中，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

新中国建立以后，李天佑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在肃清广西匪患中受到毛泽东的嘉奖。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以后，先后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领导全军训练、备战和援外等工作。他是中共第七、八、九届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他是战功卓越的开国将领，被誉为“一代名将”。1970年9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7]2004年4月1日，李天佑与夫人杜启远魂归故里，同葬于桂林尧帝园。

黄一平（1903—1980年），原名启滔，曾用名黄继、黄小波。贺县黄田新村下湾屯人。因为家境贫寒，11岁过继给叔父为子，始得入书塾读书。1919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少年黄一平也投身到反帝爱国的行列。1921年，他考入县立中学，在进步同学的带动下，阅读进步书刊，参与学生会的活动，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更加不满。

1925年7月，黄一平离开家乡，考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学习和实地考察，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10月，经黄天素、黄自强的介绍，黄一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以特派员身份回到广西，在梧州、怀集等地从事农运工作。1926年6月，中共梧州地委调黄一平转往桂平，领导桂平、贵县、平南、武宣各县的建党和农运，带动了地方工、商、学和妇女运动的开展。1927年5月，中共广西地委成立，黄一平当选为委员。在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下，他带领群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28年1月，中共广西地委改组为特委，黄一平当选为特委委员。9月，因斗争失利，黄一平赴香港向中央特派员邓拔奇汇报工作，归途遭敌特搜捕，被迫折往南洋。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并改名一平。

1929年6月，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黄一平闻讯，立即从南洋回国，旋被委派为桂平县长。因政局突变，并未到任。此时党的斗争重点已由南宁、梧州转移百色。黄一平抵百色后，经中共广西军委审查，正式恢复党籍，并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政治部社会股长，领导成立百色县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百色起义以后，黄一平分别担任红七军政治部社会科长、百色县苏维埃政府执委和肃反裁判委员会主席，后调红七军第一纵队一营任政治指导员。1930年11月，红七军在河池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以后，黄一平担任红七军前委委员和红十九师五十五团政委。为了进攻桂林、柳州大城市的需要，黄一平于12月奉派从古宜潜入桂林，从此再度失去组织关系，辗转于两广、香港、云南和福建等地孤军苦战，历尽艰险，坚贞不屈。直至1938年6月，始与老上司、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取得联系，转往皖南抗日前线。

在新四军，黄一平被任为第三支队副官。不久，他主动要求到教导队当学兵。根据他的表现和请求，当年11月，军政治部批准他重新入党。第二年，转任教导大队班长、排长、大队长等职，成为军中的重要骨干。当时新四军既面临日寇的疯狂进攻，又需应付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1940年，黄一平率所部与友军配合，在安徽和江苏3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犯，屡建战功。他的英勇善战，得到军首长陈毅、张云逸的赞许，先后出任新四军第八团和独立团团团长；同年12月，因在淮南作战负伤，调任抗大八分校军教科长和训练处长；1942年1月，调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参谋长；12月，在反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犯时身负重伤；次年5月，调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黄一平奉调东北。先后出任东北挺进纵队（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六纵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参谋长等职。在反击蒋介石挑动内战，建立并巩固东北解放区的斗争中，黄一平率部参加了抚顺、开源之战，四平保卫战，长春、辽西会战和辽沈等战役，继而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而后渡江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新中国建立以后，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四十三军参谋长的黄一平，率部参加了1949年10月解放华南重镇广州的战斗；11月又奉命率部参加解放广西和海南岛的战斗，立下赫赫战功。1950年9月，黄一平调离四十三军，先后任广东军区副参谋长、华南军区第二副参谋长、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负责广东和中南地方武装、公安与海防等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二年7月，升任广东军区政委。1958年1月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1965年3月转地方工作，任中共广西区党委常委、广西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广西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广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因战争年代两度负伤，且长期艰苦工作，1972年离职到桂林休养，1980年12月3日在桂林逝世。^[8]

钟夫翔（1911—1992年），本名福祥。原籍北流县民乐乡。1911年5月生于郁林茂林乡宝岭村农家。

1929年夏，18岁的钟夫翔从家乡往南宁，参加俞作豫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任连队文书；10月，随军开往龙州；1930年2月，参加龙州起义，编入红八军，任第一纵队第一营书记官、军需官；龙州起义失败以后，随队转战右江；10月，转任红三军军部秘书处文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参加红七军在河池整编，旋即随主力转战贵州、湖南、广东，历经艰险；1931年7月到达江西中央苏区。

当时，党正准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1月，钟夫翔当选为红七军代表，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代表大会；12月，被选派到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调红三军团无线电队工作，从此和革命通讯事业结下不解之缘；1932年春任红军总部无线电一分队政委；8月调红一军团无线电一分团政委；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

年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军委后梯队电台队长兼政委、军委二局科员；1935年到达陕北，任红二十八军无线电台队长兼政委；先后参加了东征山西和西援红四方面军，以及反击胡宗南国民党军进犯陕北等战役，出色地完成了通讯任务。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抗日战争爆发，钟夫翔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后调八路军一一五师电台队长、中队长、副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第三科长兼无线电大队长；1942年9月调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8月学习结束，随聂荣臻往张家口，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讯联络处处长；1948年任华北军区司令部第三处处长；1949年1月天津解放，任天津电信接管处处长及无线电工业处长，旋调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9月，随叶剑英南下接管广东，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电信接管部部长；解放后调任中南邮电管理局局长。

1953年，钟夫翔调北京，任中央邮电部副部长；1956年任国防部第五局（现航天部前身）局长；1957年转任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一、二机械工业部合并后任一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62年复任邮电部副部长；1970年撤部设立国家电信总局，任局长及党委书记；1973年恢复邮电部，任部长、党组书记。

新中国建立初期，钟夫翔曾往苏联作短期学习，以后又出访过欧亚10多个国家。他重视通讯科学研究和工程项目建设。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亲自主持开办多期通讯训练班，培养了大批通讯人才；建立通讯研究组，不断研究和改善通讯技术装备；从开始的5部电台发展到无线电和有线电相结合的通讯网，有力地保证了历次重大战役的通讯联络任务，对华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通讯事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党和国家、军队通讯事业的创建者之一。

钟夫翔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七届委员。1992年9月28日在兰州病逝。^[9]

广西客家的几位著名将领李天佑、黄一平和钟夫翔，分别参加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在广西的起义，而李天佑、钟夫翔和朱光，分别从广西或上海转战至江西中央苏区以后，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间，分别在农民运动、革命武装、政权建设、通讯、文艺和外交等方面艰苦奋斗，为国家的独立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受人民的尊敬。

广西客家的科学技术精英

在科学技术方面，广西客家也有不少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备受赞扬的学问大家，如文史专家王力、罗尔纲，民族学家江应樑、徐松石，化工专家李运华，植物学家钟济新，兽医学家叶浩，医学专家叶馥荪、叶培等。

王力（1900—1986年），本名祥瑛，14岁时改名王力，字三一。祖籍福建汀州。明初其先祖迁广西博白，后迁岐山陂村。1900年8月10日，王力出生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

他的父亲是个秀才。但王力尚在幼年，家道已经中落。他上完小学，就因家贫失学了。1913年，13岁的王力一面勤奋自学经史子集之学，一面以办私塾、教家馆和小学维持生活。

1924年秋，王力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取上海南方大学，第二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博学明辨、务实创新精神的熏陶下，奠定了他从事语言研究的治学之路。1927年冬，王力赴法国留学，主攻实验语音学。他注意学习西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经过4年的努力，完成了《博白方言实验录》的论文，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王力学成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始终以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为自己的主要工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王力曾兼任华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广州市人民代表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继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是我国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主持者之一。他还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祖国统一工作组副组长等职。

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力以教学、科研、著述相结合，写下了近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出版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近200篇。早在留法期间，他的处女作《文话评议》论文即在巴黎发表，还出版了《老子研究》的学术专著，翻译并出版了纪德的小说《少女的梦》。1932年回国后的几年间，他又出版了《论理学》《希腊文学》《罗马文学》以及剧本《中上流社会》等专著和译著共16部之多。1936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先后出版了《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上下册）和《中国语法理论》（上下册）等重要学术专著。王力治学，首重证据，力求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建立在充实的例证之上；强调博采百家，中外联系，古今融通，不囿于一孔之见、一家之言，而以学术为现实服务。

在语言学方面，王力对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法、词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精心的研究，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吸取了外国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他为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构建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作出卓越的贡献。他的专著《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和主编的《古代汉语》，以及《诗词格律》《汉语音韵》《清代古音学》等，涉及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极具开创性。他还编著《同源字典》《康熙字典读音订误》等书。他的杂文《龙虫并雕斋琐言》，词章清雅，讽喻精妙。他的不少名篇巨制被译成英、日、法、俄、德和捷克等国文字出版。美国把他的《汉语诗律学》列为研究生必读书。苏联把他的《汉语语法纲要》定为汉学教材。欧洲、美洲、亚洲不少国家把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汉语基础课教科书。他曾到日本、波兰讲学。1980年8月10日，首都学术界召开庆祝王力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座谈会，日本、美国、香港等地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王力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的学术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是众人敬仰的语言学巨匠，中外知名的学者。1985年，他把《王力文集》20卷的稿酬10余万元，全部捐作“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基金”，同时还大力资助“博白中学奖教奖学基金会”，热心奖掖后进，为我国文教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1986年5月3日，王力在北京逝世。^[10]

江应樑（1910—1988年），祖居贺县（今贺州市）莲塘白花圩。清光绪年间，他的祖父江海清到云南做官。1910年2月7日，江应樑生于昆明人称“家资百万”的仕宦之家。甫5岁，祖父在贺县去世。不到一年，昆明江家彻底破落。未几，父亲去世，家境非常窘迫。8岁时，江应樑被卖到寺庙当小和尚。他自幼勤奋好学，恳求师父月溪法师让他继续读书。法师见他年幼，身处困境仍有志于学，遂以穿和尚服上学，熟背每天指定佛教典籍，完成规定的大、小楷习字，且每年必须考取第一名为条件。应樑不负所望，从小学直至云南省立师范毕业，始终保持学习成绩第一名。

1927年，江应樑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学习文史和社会学课程。因成绩优秀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35年南下广州。第二年，以《研究西南民族计划》一文考取中山大学研究院人文组研究生，师从朱谦之、杨成志，全面学习有关课程及田野考察方法、摄影技术，走上了终生从事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道路。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是江应樑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1937年，他参加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联合组成的黎苗考察团，深入五指山考察，发表了论文多篇。为了进一步研究黎、壮、傣的族属关系，中山大学研究院和云南地方政府合作，派江应樑入滇考察。他不仅进入腾龙沿边傣族地区作田野调查，而且足迹几乎遍及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据此，他出版了《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文化生活》与《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等专著，以及《摆夷的种属渊源及人口分布》《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西南边疆的特种文字》《云南土司制度的利弊与存废》和腾龙、思普、大小凉山沿边开发方案等论文。

1942年至1945年秋，江应樑受命主持云南边疆行政设计工作，首次完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名称、分布和人口的普查。1947年，江应樑到广州，在中山大学等高校任教；第二年秋，应云南大学之聘任社会系教授，主讲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调查等课程；1950年应人民政府之命，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滇西各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1953年，人类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社会系被撤销。江应樑转至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埋首书斋，撰写《傣族史》《西南民族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图集》等专著及《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等论文。无奈“文革”时所有书籍及亲自拍摄的数千张照片全被抄走。

“文革”结束以后，江应樑在“再见阳光”中完成了《百夷传校注》，重新撰写《傣

族史》，发表了多篇为民族学、人类学正名的论文，组建了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所，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主持编写了《中国民族史》一书。

1988年11月11日夜，江应樑在与研究生论学时安详地辞世。[11]

罗尔纲（1901—1997年），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01年1月29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本生父罗佩珠是个秀才。罗尔纲一生下地就过继给伯父罗佩璜做儿子。父亲曾到桂林应试，还未中举就过世了。罗尔纲从小受到母亲的严格教育，并阅读了父辈们所藏的文史书籍，为他后来在做人与治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罗尔纲负笈上海，就读于浦东中学；第二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时正值大革命前夕，年轻的罗尔纲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了《农民运动的紧要》《怎样集中革命力量》《辛亥革命十五周年纪念》等诗文多篇，体现了强烈的革命爱国情怀。1928年，他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1930年毕业以后，应校长胡适之约，到他家整理其父胡传的文稿。通过认真、细致、艰苦的实践与胡适在治学上的严格指导，罗尔纲养成了不苟且的做人和治学态度，学到了耐心、细致和艰苦求索的考证方法。

1931年秋，罗尔纲回广西省亲，在贵县中学任教，同时兼任贵县修志局编纂，并从考证张嘉祥的事迹开始作太平天国史的研究；1934年起，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助教。1937年秋，北平沦陷。11月，罗尔纲南下长沙，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纂及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几年之间，完成并出版了太平天国史、晚清兵制史、捻军史、天地会文献等著作12种，发表文史论文50余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尔纲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南京大学教授；1954年4月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1950年起曾先后任广西贵县和南京市、江苏省人大代表，1954年后历任第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尔纲文史兼资，尤工考证。他治学70年，在太平天国史、晚清兵制史和《水浒传》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厚的成绩，总计完成并出版学术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400余篇，共计约700万字，其中太平天国史专著即近30种，论文近250篇，还整理、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3000余万字，涵盖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各个方面，他是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37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太平天国史纲》，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评为“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括性著作”。新华社在《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去世电》中说：他的“150万言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不仅是他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

罗尔纲对晚清兵制的研究始于1936年，除清代的八旗兵制当时已有学者研究外，其他如绿营、湘军、淮军、新建陆军、海军、练兵和兵工生产等他都有专门研究。早在1939

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的《湘军新志》，1946年出版了《绿营兵志》。20世纪80至90年代，两书通过改写，连同包含《淮军志》《癸甲练兵志》《陆军志》《海军志》《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六卷的《晚清兵志》，转由中华书局出版。它论述了晚清兵制的全部演变过程及其得失。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称赞罗尔纲是“中国军事历史学家”，认为他的著作“对充分了解晚清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本质极其重要”。

对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罗尔纲通过60余年的研究，写出了《水浒传原本》与《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两部专著及论文多篇，对《水浒传》的著者、成书年代、主题思想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在金石、训诂、史著体裁和撰史方法等方面，罗尔纲也都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罗尔纲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简朴，虽至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1997年5月25日，罗尔纲在北京逝世。^[12]

徐松石（1900—1999年），名振凡，字松石，或作仲石。祖籍广东肇庆府新兴县（在高要县西南）。1675年（康熙十四年），其先祖迁广西梧州府容县辛下里，今为浪水乡白饭村泗把屯。

徐松石自幼勤奋好学，年未及20即负笈上海；1922年上海沪江大学毕业以后，在中学和大学教授史地，并利用教学余暇，开始到岭南做社会调查；1927年，在广西北部旅居数月，“搜集材料甚多”，“增加心得不少”；1930年留学美国，就读于田纳西大学，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一面在上海执教，一面继续往岭南各地进行社会考察；1935年应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之约，回广西任全省国民基础教育暑期训练班主任之职，并就近在邕宁和左江各县作实地调查采访，自云此次考察，“对于以前研究心得，尤多证实”。1938年春，他又利用教学余暇，在广东南路旅行一周，然后再入广西，在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民政厅长邱昌渭的帮助下，“由桂林出发，经桂北、湘西、黔中、黔南、桂西、桂中和桂省东南，曲曲折折走了一个圈子，深入瑶山、苗山和壮人区域。又在桂平都合考察铜鼓的出土和各种古代的石刻。于是这岭南古代史地和岭南古代文化的研究，才告一个相当段落”。这年冬，他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粤江流域人民史》；1945年又完成了另外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泰族僮族粤族考》。两部专著，奠定了他在民族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1957年，徐松石移居香港，在大学任教。1975年，他从香港赴美国定居。他一如既往，坚持教学与研究并行，20多年间，又出版了《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日本民族的渊源》《百粤雄风岭南铜鼓》《华人发现美洲考》《禹迹华踪美洲怀古》等学术专著10余部。他以中英文写作的《华人发现美洲考》（上、中、下三册）出版时，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

徐松石从事学术研究，走的是文献稽查和社会调查结合的道路，不论身居书斋或步入

田野，凡有关地理形势、历史传闻、民族风习，多有收录。他视野宽广，善于联系，对问题考证，则多从地理而推论历史，他名之曰“地名研究考证法”。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和《傣族僮族粤族考》两部著作中，论证两广以致西南各省古代的地理环境、最初居民、各个少数民族和他们中的彼此关系，以及僮族和岭南苗瑶各族，还有泰国、越南各国人民的关系时，就用了僮语中的地名称呼作为依据。他认为我国的盘古、伏羲实即一人。汉人《越绝书》中提到的“鸟田”，往者多望文生义，释为飞鸟耕田。而徐松石从“鸟田”与现代马来语 lautau 读音相近，而马来语 oiangtautan 又与现代浙江宁波语的“阿拉鸟田人”相似，再联系其习俗等，从而认为：早在数千年前，中国浙闽等濒海地区的居民，即已迁移马来半岛，成为当地的土著民族。其他如中国和泰、越、韩、日以至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渊源关系，徐松石也都凭借广泛的实地调查，丰厚的资料积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一家之言。

1984年，徐松石写了《美洲怀古六韵》，其中第五、六韵写道：

美南美北本亘洲，鸟迹娄踪几度秋；
无限乡情谈不尽，滔滔江汉水东流。
美洲发现鸟田誇，两岸蓬瀛本一家；
故梦重温无限感，山长水远念中华。

1992年，在福建长汀举办客家研究大会，他“有感而赋诗八首”，其中一首云：

马来吴越本宗亲，泛美开疆亦鸟人；
留得客家研究在，中华名望日增新。

徐松石虽然离乡背井数十年，重洋远隔，但他的家国之思，族系情结，并未稍减。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把后出的《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华人发现美洲考》等5部著作，合编为《徐松石民族学研究五种》影印出版，他在“自序”中对中国和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始终屹立不败感到自豪，深情地表述了“我爱中华民族”的诚挚心声！^[13]

李运华（1900—1971年），贵县东龙乡冠志塘村人。他自幼勤奋好学；稍长，即远离家乡，负笈北平从师；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时年21岁。

李运华以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即奉派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理论化学，撰写人造汽油论文获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应用化学和物理化学，并任化学工程师；1927年，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他发明奈酚制革物料12种，获美国政府专利局发给专利权状及奖励，受聘为美国罗杰斯化学工程公司总设计师，主持染料研究和设计。受聘期满，公司以高薪续聘。但他报国心切，决定放弃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研究条件，于1928年夏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

28岁的李运华回国以后，立即被聘为广西省建设厅技正兼工业主任；不久，转回教育工作，先后被聘为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并从事研究工作。

他在研究压力与沸点关系中发现的新规律和导引出的公式，经国内外学者验证，准确度高，误差小于千分之一。该公式命名为李运华公式，被国内与英国大学遴选为教材。

1933年，日寇进犯长城古北口时，施放毒气杀害我国军民。李运华义愤填膺，夜以继日地研究抗毒气药剂，成品性能超过德、意、英等国的同期同类产品，同时创造有色烟幕泪弹多种，赶制防毒面具8000多套，支援抗日前线。他的专著《防毒面具》一书，亦于当时出版问世。

从1935年起，李运华先后任广西化学试验所所长，广西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教务长，广西省工业试验所所长等职。为家乡培养人才，并对广西各地矿产、油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试验。1943年，因战备物资奇缺，他与彭光钦教授合作，采用广西野生植物大叶鹿角藤胶及凉粉果胶，研究国产橡胶，制造汽车轮胎、胶鞋等多种产品获得成功；1944年秋，出任广西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前夕，出任全国救济总署广西分署副署长，办理联合国援华物资及救济工作；抗战胜利以后，先后出任国防科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考试院考试委员，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等职。

新中国建立以后，李运华出任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化学部主任、物理化学研究室主任，主持天然橡胶的成分、含量、性质、检验方法与快速测定等一系列试验，成绩显著，填补了我国橡胶科研项目的空白。十年“文革”期间，李运华虽然受到无情的迫害，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不放弃科学研究工作。1971年10月，因心力交瘁，病逝于广东湛江。^[14]

钟济新（1910—1993年），苍梧县林水镇思念村人。1928年就读于梧州省立二中，1931年考入广西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一年后转入生物系，1935年毕业，留西大农学院任教，并在西大植物研究所和梧州试验场工作。从此他和植物学的调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终于成为著名的植物学家。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建立广西农学院。植物研究所归学院领导，钟济新任学院教授并负责研究所工作。1954年元月，植物所改隶中国科学院，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工作站，半年后改为华南植物研究院广西分院，1958年又从华南植物研究院分出，建立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尽管名义屡更，钟济新始终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钟济新教学认真，治学严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认为：广西多山，地形复杂，植物资源丰富，用途广泛，与工、农、医药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经常带领学生和职工跋山涉水，深入实地，从广东北部至海南，从广西的越城岭、大苗山、大瑶山、勾漏山，直至武汉附近，都留有他调查采集的足迹。每至一地，他必亲自调查访问，采集标本，观察记录，发现了不少珍稀物种，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标本资料，如1936年在广西越城岭发现的杜鹃花新种，在猫儿山主峰发现的杜鹃花科、木兰科、槲树科的新种，以及长苞铁杉和竹柏的新公布，还与同事一道在大瑶

山发现了桃金娘科岗松属植物。1947年他又先后在桂林雁山及其附近发现了松科黄枝油杉新种，大戟科乌桕属新种“钟济新乌桕”。在广西植物研究所的标本馆里，有许多蜡叶标本就是他亲手采集压制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至1973年，他共采得植物标本8533号，为植物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新中国建立以后，钟济新扩大了学术研究空间，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要者如：1950年在临桂发现了山茶科山茶属新种宛田红花油茶；1954年在龙州发现了山竹子科山竹子属新种金桂李、椴树科蚬木属新种蚬木、大戟科新植物肥牛树，以及降压药用植物广西野生的萝芙木，从此结束了我国依靠进口原料生产降压药的历史。从1951年至1954年，他主持了华南橡胶宜林地的调查。1955年在广西花坪林区动植物资源的调查中，继我国第一个植物“活化石”湖北水杉之后，发现了我国第二个植物“活化石”银杉。1956年至“文革”前的10年间，他先后参加了中国与苏联、中国与民主德国、中国与捷克等国学者联合的植物考察，参加了桂林市绿化和花坪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规划，并且出访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77年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在南京召开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和生物6个学科的规划会议，并参与生物学科规划的制定；第二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广西和全国的科学大会。1978年，因钟济新在植物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他获得了广西科学大会奖。

钟济新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曾任该党中央委员，广西区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曾被选为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第三、五届人大代表，第五届人大常委，广西第四届政协委员。他还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第六、七、八届理事，中国植物学会广西分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和第二、三、四届理事长，广西植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广西科联委员，桂林市科协副主席等。在参政议政和学术活动中，他提出了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的历史遗产，关注天然水源林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等对国计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

在50多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钟济新写下了有关经济植物、植物分类、水源林和自然保护、石灰岩石山植物以及有关林业等方面的论著约50篇（部），另有译著两种。

1993年6月27日，钟济新在南宁病逝。^[15]

叶浩（1917—1995年），又名灼荪。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桥头街人。出生于富有家庭。

1942年，叶浩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他南下广州，转入华南农业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并兼任兽医内科、外科教研室主任，特医系副主任，兽医针刺研究室主任。1975年开始利用中华传统的针麻学说，主持《家畜电针麻醉临床应用》课题研究，其成果获1979年广东科学大会奖。1981—1985年受命主持农牧渔业部重点科研项目《兽医针刺麻醉临床及原理的研究》课题，其成果获1985年农牧渔业部畜牧业重点科研成绩显著奖。由于30多年对兽医事业研究的重大贡献，1987

年叶浩获得农牧渔业部的表彰。

叶浩对兽医外科学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和肯定。1980年起，先后有澳大利亚、伊拉克、瑞士、墨西哥、丹麦、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前来向他学习兽医针灸技术。1983年，叶浩率领中国兽医临床学术访欧代表团，访问了英国剑桥大学、联邦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等20余所大学与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增进了友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还受农业部的委托，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兽医外科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

叶浩治学严谨，重视理论与实际结合，为现实服务。他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译著主要有：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家畜外科学》（上、下册）；（美）F. W 依姆主编的《大动物手术学》。无论是编著或译著，叶浩都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外，由他主持并参与撰写发表的论文有《大脑皮层在针刺麻醉中作用的研究》（I）-（V），《水牛亚硝酸盐急性中毒》等论文10余篇。

叶浩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忠诚人民教育事业。他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授予他“优秀党员”称号。1991年，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授予他“优秀盟员”称号。他的校外兼职有：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外科研究会副理事长，广东畜牧兽医学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所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常委、顾问等职。

由于叶浩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美国传记协会（ABI）推荐他列名于《世界名人录》一书，并将个人传记载入《国际荣誉大全》书中。

1995年1月11日，叶浩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16]

叶馥荪（1913—2001年），1913年1月生于融县融乐镇桥头街（今属融水苗族自治县）一个富裕的书香之家。1938年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以后，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任医师。1943年回广西省立医学院从事教学和医疗工作。1947年公费选送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内科进修班学习，1949年回国，在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难民署医院工作，直至解放。

新中国建立以后，叶馥荪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49医院任内科主任，1950年回广西省立医学院任内科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兼任学校行政和党委的领导工作，广西肿瘤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为广西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学院校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1951年广西医学院从桂林迁南宁。叶馥荪针对南宁地区扶绥县及周邻各县肝癌患者较多的情况，遂以探索肝癌防治为科研主攻方向。先于1961年组建肝癌调查队深入肝癌病人最多的扶绥、贵县等地开展调查。他经过近10年的实地普查和深入的研究，一是明确了扶绥县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世界肝癌高发区之一；二是通过对当地口粮和饮水的细致检测，结合国外学者关于粮食霉变能引起动物肝癌的报道，用发霉粮食作大鼠诱癌试验，

同时通过对数万人次的调查，千万份粮食和血标本的检测，明确了肝癌高发与口粮污染黄曲霉素程度、肝癌背景和饮用不洁塘水密切相关，进一步论证了黄曲霉素、乙型肝炎感染和饮用水污染是引发肝癌的三大危险因素。

1969年全国肿瘤学术会议期间，《天津医学杂志》发表了叶馥荪等撰写的《广西某县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及流行因素初步探讨》的论文，并展示了广西实验动物诱癌成功的图片。1978年叶馥荪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3年、1981年和1984年，叶馥荪先后在意大利、日本、美国召开的国际肿瘤会议上宣读了《广西肝细胞癌的流行病学及发病学研究》《中国原发性肝癌的流行病学及早期诊断的研究》等论文，得到国外学者的肯定，两文分别在日本、美国杂志发表。美国加州大学主动与叶馥荪签订《肝癌与鼻咽癌流行病学研究》的协议，由美方提供经费进行合作研究。在此期间，他还先后赴东德、波兰、捷克、苏联和越南等国访问并作学术交流。他承担的“六五”国家攻关项目《肝癌预防措施——黄曲霉素在肝癌病因的作用及阻断研究》，1987年获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为了培养肝癌防治人才，在他的建议或主持下，成立了扶绥和广西医科大学肝癌防治研究所。

叶馥荪曾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广西第四次党代会代表、党委委员，广西第五、六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曾兼任全国医学会、内科学会、抗癌协会、全国和广西科协等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以及国家教委颁发的“从事高校科技工作40年，成绩显著，予以表彰”的荣誉证书。1990年12月退休。2001年4月在南宁逝世。^[17]

叶培（1910—2003年），融县融乐镇桥头街（今属融水苗族自治县）人。1910年生于著名的山主兼木材商之家。青年即外出求学。1934年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毕业，转往德国留学。1937年冬获德国汉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又先后入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主攻内科和小儿科。

1939年，叶培从欧洲回国，先任上海宝隆医院医师，后回乡任广西军医院医师，广西省立柳州医院内科兼小儿科主任，广西省立医学院儿科副教授、教授兼附院院长及省立桂林高级护士学校校长，为广西医疗事业和医护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广西解放前夕移居澳门，受聘于镜湖医院专事医疗工作。

广西解放以后，百废待兴。1950年，广西省主席张云逸托人致函叶培，请他回广西工作。他深感共产党重视科技人才，且身为广西人，理当应召回乡，以自己的医学技术为人民服务。于是放弃澳门镜湖医院的优厚待遇，回到柳州，受聘为柳州市立医院院长。当时柳州城乡天花疾病流行，而被解放的妓女普遍染有性病。叶培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并组织医护人员采用防治结合的方法，很快解决了问题，受到人民政府的赞扬。

1953年，广西省政府决定成立卫生厅，任命叶培为副厅长，主要负责领导全区的医学技术和妇幼卫生工作。他在卫生厅工作的17年中，为广西培养医护人员，落实党有关医

卫事业发展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政策，大力防治血吸虫病、霍乱、痢疾、脑膜炎等地方病和传染病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或在“文革”中遭受无情批斗的时候，他仍兢兢业业，为妇幼保健和小儿科医生的培训做了大量工作。后来许多医院的小儿科骨干医生就是那时培训过的。

叶培重视医学科研工作，主攻小儿呼吸道疾病的防治。他筹建了小儿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研究室，对病毒性肺炎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病原学和微循环学方面，他和助手们带领研究生做了细致的监测，搜集和分析了4000多个数据，写出的论文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评为一级优秀奖，并通过了叶培提出的肺炎合并心力衰竭的诊断标准。他的主要专著有《小儿肺炎》以及有关论文20余篇。

新中国建立以后，叶培被选为全国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第六届委员；广西第一、第五、第六届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和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广西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曾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从事高校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予以表彰”的荣誉证书。1990年12月退休。2003年在南宁逝世。^[18]

当前，在我国的科学技术战线上，涌现了不少广西客家科技精英。他们成长在新中国，正在为国家的进步和富强努力工作，作出贡献。如：陆川县横山乡的李京文，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技术经济、工程管理、科技进步生产率理论与方法以及经济分析与预测等方面的研究，为创建我国新兴学科——技术经济学，建立我国工程论证、规划与决策的理论方法和制度，开创我国数量经济与方法，预测经济技术发展趋势，制定产业、地区发展战略与技术政策等作出了重大贡献。已出版专著4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博白县合江镇的刘庆贵，我国著名的宇航、导弹专家，曾任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中国宇航协会理事、中国宇航协会发射实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参加过中国第一颗卫星、科学实验卫星、返回式卫星发射任务20多次，参加中国战略导弹、战术导弹发射实验任务100多次，曾获得科技进步奖，著有《载人飞船探秘》《载人飞船基础》《航天发射场概论》等多种著作和相关论文30多篇。此外，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还有不少广西客家学者、专家、教授从事科研、教学以及各项科学技术工作，为祖国的富强，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1] 黄志荣主编：《陆川县志》第三十三篇《人物·名人》；又参庾新顺等编：《八桂将军风云录·桂系虎将·廖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禰德煥等：《八桂将军风云录·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新编《防城县志》第二十五篇《人物·历史名人传略·陈济棠》。

[3] 参看潘乐远主编：《合浦县志·人物篇》第六十八章《传略·各界人士·陈铭枢》；政协合浦县委员会编：《陈铭枢纪念文集(1889-1989)》(内部印行)，1990年。

- [4] 梁鲁：《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见柳江县志编委会编《柳江文史》(6)，1987年；梁鲁主编：《柳江县志》第二十六篇《人物·名人·刘震寰》。
- [5] 龙兴智主编：《浦北县志》第二十五篇《人物·名人传略》。
- [6] 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卷二十六《人物》第一章《革命烈士·朱光》；《八桂将军风云录·传奇才子朱光》。
- [7] 李荣典主编：《临桂县志》第三十二篇《人物》第一章《人物传·革命英烈·李天佑》；又参看《百色起义人物志·解放军将领·李天佑》；《八桂将军风云录·一代名将李天佑》。
- [8] 参看唐择扶主编：《贺州市志》第三十一篇《人物》第二章《名人传略·黄一平》；《百色起义人物志·解放军将领·黄一平》；《八桂将军风云录·传奇将军黄一平》。
- [9] 梁树礼主编：《北流县志》第三十一篇《人物》第一章《当代名人·钟夫翔》；《百色起义人物志·钟夫翔》；《八桂将军风云录·通讯专家钟夫翔》。
- [10] 参看朱德华：博白略圻《王氏族谱·序》，道光二十三年；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卷二十六《人物》第一章《历代名人·王力》；陈振寰选编：《王力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 [11] 据云南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江晓林教授提供的资料。
- [12] 参看罗尔纲：《生涯六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拙文《罗尔纲文选·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罗尔纲同志治丧办公室：《罗尔纲同志生平》，1997年6月11日。
- [13] 参徐祖椿等编：容县、北流、藤县《徐氏族谱》；韦荫炎主编：《容县志》第三十四篇《人物》；引文分别见《粤江流域人民史》、《华人发现美洲考》及《徐松石民族学研究五种》序言。
- [14] 参看罗甫琮主编：《贵港市志·人物志·历史名人·李运华传略》；李会洪：贵县《李氏族谱·八世祖运华公事略》，1990年。
- [15] 参看毛宗铮：《钟济新传》(未刊稿)；陈云枢主编：《苍梧县志》第三十一篇《人物·著名人物·钟济新》。
- [16] 贾星文主编：《融水苗族自治县志》第二十四篇《人物》，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 [17] 广西医科大学校志办公室编：《广西医科大学志》第九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介绍·叶馥荪》，2004年；蒙荫昭主编：《广西古今教育人物·叶馥荪》。
- [18] 广西医科大学校志办公室编：《广西医科大学志》第九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介绍·叶培》，200年；蒙荫昭主编：《广西古今教育人物·叶培》。